

文化批判論壇／

買不起，租不起—

貧窮化社會下的居住權危機與文化行動反抗策略

時間：2010年7月17日 14:00—17:00

地點：UrbanCore Café & BookShelf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
路一段 89-6 號 1 樓)

主辦單位：台灣當代漂泊協會、遊民行動聯盟

贊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電信工會、文化研究學會

主持人：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遊民攝影班創辦人）

與談人：王增勇（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

黃麗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

阿春（當代漂泊成員）

朱傳炳（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

郭盈靖（當代漂泊成員、遊民行動聯盟召集人）

追影（當代漂泊成員）

戴瑜慧（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大眾傳播與媒體藝術

airiti

術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遊民攝影班創辦人)
人)

郭力昕（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記錄人：賴品瑤

戴瑜慧：

很謝謝大家來加入這個論壇，由當代漂泊與文化研究學會一起舉辦的文化批判論壇。相信很多的朋友，之前，或是更早之前都有來看過我們的居無定所攝影展。很多的朋友看了這個攝影展以後，也跟我們分享他們的感想和心得。像昨天我們去新頭殼，在短短的30分鐘，網上的即席討論，就有好幾個網友提出問題。例如，像網友太郎就說，如果台灣遊民也有尊嚴，台灣才真的是一個文明國家，然後也問到政府目前對遊民有任何照顧政策嗎？或是政府應該做什麼？那像黑貓他就問說：遊民攝影師與一般攝影者的圖像故事會有不同嗎？有沒有發現遊民攝影師普遍喜歡什麼樣的素材？這是一些朋友提的問題。

相信大家看了居無定所攝影展以後，有很多的感想以及問題想要討論，這場論壇是居無定所攝影展的一個延伸，希望可以更進一步比較深刻的去討論：遊民作為一個台灣底層的勞動者，目前遭遇到的居住權的危機，以及在危機之下，他所發展出來的文化行動反抗策略。其實遊民的議題由來已久，也是長久以來媒體追捕的一個焦點，也是國家政策一直想要擺脫的一個難題，那也辦了大大小小的研討會。

這次的研討會雖然規模不大，卻是這麼多年以來，台灣第一次有從批判觀點出發，由遊民作為一個主體，發聲的主體的一個研討會。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謝謝大家一起來參與，有時候歷史是往前進一步可能又退兩步，但是有時候我們就是這樣慢慢的前進，很謝謝大家一起來參與，我們為社會的前進一起努力。先介紹今天的主題--買不起、租不起，貧窮化社會下的居住權危機與文化行動反抗策略。

我們先介紹今天的流程：今天分成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政策與社會排除。我們邀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王增勇老師、台大城鄉所黃麗玲老師、還有我們很優秀的遊民攝影家阿春姐，每

位來賓發言十分鐘，接下來歡迎大家一起討論，我們今年的海報大家都非常喜歡，我們鼓勵發言，有發言的朋友我們就送一張海報。

第二場的主題是遊民與底層勞動者：這一場我們歡迎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朱傳炳大哥，當代漂泊創辦人、遊民行動聯盟創辦人郭盈靖，我們的資深遊民攝影家追影大哥。

第三場，我們是來談文化行動反抗策略，瑜慧會跟大家分享漂泊攝影班與我們的遊民行動反抗聯盟策略，還有政大廣電系系主任郭力昕老師。

在進入第一場主題之前，請大家一起來看看，我們為了這一次居無定所攝影展拍的一部短片。

（影片播放）

戴瑜慧：

剛剛的歌詞是我們的朋友晨曦譜的詞，我們的王增勇老師也已經到了現場，王增勇是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副教授，老師的專業領域是社會福利政策，老師更是身體力行，支持了許多弱勢團體，很銳利的分析國家社會福利政策跟人民群體關係的分析。

第一個主題：政策與社會排除

王增勇：

大家午安，其實接觸這個攝影展，最初是因為盈靖的論文，我覺得這個論文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把聲音還給被研究者，那個東西相對於現在所有的學術論文，很大的不同是：她把研究的體裁，研究的資料，甚至資料的詮釋都還給了我們的街友，透過他們的眼睛，來看到他們的世界是什麼。我覺得學術的世界一般也反映了我們這個社會對於街友一般的看法，都認為他們是需要幫助，都認為他們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視角的轉換是這個行動非常重要的轉移，然後整個社會對於街友的理解，其實我要講的第一點是說：其實街友這個現象是一個流動的現象，他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最早談論的時候，包括台灣怎麼對待街友，一開始的時候，處理的不是社會福利體系，一開始，大概在二三十年前，街友的體系是由警政處理。所以街友一旦被發現，是會被送到警察局去，因為他們被當成是一個治安上面的問題。然後開始認識街友是需要幫助的一群人，大概是二十年前之後，才由社會福利來接管，但是社會福利在接的時候，你也會發現社會福利並沒有打算替他們解決真正的問題，社會福利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也只是想要讓他們離開街頭，讓他們能夠不要干擾到主流社會的運作。

所以這樣的一種國家的處理，並沒有真正的回應到街友他們現在所經驗到的，他們所真正面臨到的問題。在過去的討論裡面，很多人認為，在西方的討論裡面，街友會跟所謂的六零年代的精神病患的去機構化的政策扣連在一起，認為是很多的精神病患被從醫院放出來之後，才導致街友的數量增加。那其實台灣並沒有這個問題，台灣的精神病患從來沒有機構化的問題，國家從來沒有對精神病患大量收容的政策。那開始大家越來越注意到的是，街友是跟整個都市的更新有關係。在紐約，大家開始注意到林肯中心，那個在紐約市中心曼哈頓開始都市更新，開始所謂中上階級需要的藝術欣賞的場地，開始興建的時候，他們開始注意到紐約的街友開始增加。我覺得這個東西，大家就開始注意到我們的房屋政策、土地利用的政策，在這一連串國家對土地的使用，怎麼樣把他變成是一種商品化的東西，然後把居住變成是一個你必須有一定的消費能力才能夠擁有的東西，而不再視為是人基本的權力。

我們在討論福利國家，會包括四個重要的面相，其中一個是教育，你認為教育應不應該是一個商品？這個東西共識會比較高，很多人認為教育是應該的；那麼第二個就是居住，你認不認為居住是

一個商品，那還是居住是一個權利？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人，大概都會讀過三民主義，我對三民主義的記憶不多，但是我一直很記得所謂的土地漲價歸公，任何土地的社會的成長，土地的增值的收穫應該歸於公共利益所有，而不應該變成是個人獲利的工具。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一直都像一個教條一樣，從來沒有在台灣真正的實施。我想二十幾年前，1988年無殼蝸牛運動，我想是少數對於台灣房價的波動，台灣人民開始用一種社會運動來要求居住是一個權利，但是20年過去之後，這個現象只有更為嚴重，然後在這樣的一波裡面，其實你可以發現在台北居住的人，這是一個慢性的迫遷，不管是從幾個都市更新的案子，從14、15號公園、到後來樂生療養院、到後來三鶯部落，我們大家都會發現原來整個社會裡面本來有涵養弱勢者的能力，其實在這種社區重組裡面、被商品化的邏輯，會發現在那個社區其實是沒有了。

我們以前在服務萬華的時候，以前我們在做老人居家服務，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老人，他是一個視力障礙的朋友，但是他住在那個社區裡面，我們能提供給他的居家服務非常的少，但是那個社區大家彼此互相認識，所以那個老人只要坐在門口，聽到有誰進進出出，他就可以隨時喊出來我需要買什麼東西，你能幫我做什麼，所以其實他只要在門口，他其實就可以生存下來。但是那樣一種老舊的社區，一種社會的網絡，在都市更新裡面重新換了一批的人上來，你會發現這種舊有社區可以涵養弱勢者的社會包容、社會文化，其實是完全被剝奪的，被取代，原來其實可以被社區照顧的弱勢者，是在這一些社會的基理跟脈絡，在這種新的都市更新的商品化的邏輯之下，是被剝落的，這些人就從這些社會的社區的基理裡面一個一個的脫離出來。

所以我覺得，整個遊民的現象，其實是包含了很多的現象，但是我覺得絕對是跟台灣土地的利用，還有整個房屋的政策，還有我們社會福利在這個體系裡面，並沒有提供一個安全網絕對有相關。

那麼再一點就是，照理來講，社會救助，低收入戶應該是提供有需要被幫助的人最後一道的安全網。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台灣有全世界最低的低收入戶比例，大概只有百分之一，十年前只有百分之零點五，曾經我們的新聞局，把他當作是三民主義經濟發展均而富的一個證明，但是其實事實上證明不是，就算是北歐國家的低收入戶都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台灣按照現在基尼的指數，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之下，但是低收入戶卻沒有。

後來社會福利學者真正去瞭解，大家得到一個結論是，台灣社會救助的體系，行政程序過於複雜，以致於真正有需要的人，其實往往無法進入。舉例來講，我們計算戶口的收入，是全家的收入都要算進去，而且就算你沒有工作，只要你沒有提出你有疾病的證明，我們就自動的假設你有臨時工兩萬三的收入，他不管你前面，還有薪資證明不是證明你現在沒有收入，他看的是你去年的收入，如果你不小心還被你的子女報去扶養，你的子女的收入還會自動算進來。這種種的關卡，為了要政府防弊，為了要確保人民負起家庭互相照顧的責任，但是卻不去管到底在真實上面，收入有沒有真正的發生，在這樣種種的防弊的情況之下，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完全沒有發揮功能。

但是低收入戶，卻又是所有社會福利措施最基本的門檻，所以我想，大家只要想一想說，我們一方面放任這個土地跟房屋做為一種商品化的市場，但是在另一方面，國家在社會福利的網，卻又把口開的非常的小，其實他的目的是要讓人民在這個裡面，那麼讓弱勢者在市場上沒有辦法滿足溫飽的人卻又進不去國家的社會福利的網絡裡面來，卻又承受整個社會給予他的一種污名，認為遊民就是愛酗酒，遊民就是不努力工作。但是事實上，如果大家仔細去看，我們遊民的組成人口裡面，有工作的人的比例其實是非常的高，其實他跟我們一般所認識的遊民形象有相當大的落差，所以我覺得居無定所這樣的一種讓遊民來自己說自己的生活是什麼，讓大家知

道，其實遊民他們並不是個人的因素，也不是個人可以選擇，事實上是整個在就業政策上面、在房屋政策上面，還有社會福利政策上面，多方的失敗，其實讓他們並沒有太多的選擇。

那我覺得把那個聲音還給他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攝影展，讓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所看到的世界，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點，我也覺得把這樣的聲音還給遊民，讓大家能夠看到他們真實的世界，我覺得是這一切，我們可以重新面對很重要的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我也要恭喜你們這一個攝影展的開始，也要恭喜你們，尤其是所有參與的街友，能夠站出來把自己看到的世界公布出來，我覺得這個過程本身，一定非常的不容易。那麼我也會非常希望，待會能夠聽聽看他們自己在這一個攝影，跟在自己展示的過程裡面他們所經驗到的心路歷程，那麼我想簡單的開場就到這裡，謝謝。

戴瑜慧：

謝謝王老師，其實像我們昨天跟媒體朋友討論的時候，他就先問說遊民的定義，遊民就是沒有地方住、不工作的人。他已經先在定義上把你定義成不工作的人，那其實反映出我們台灣的社會迷思，非常非常的強烈：遊民等同於懶惰、不工作。老師剛剛也提到說，像低收入的認定，他其實就是一個國家社會願意對這個社會的底層多少比例的人群提供資源幫助，例如說你願意對底層的百分之五的人或是百分之三的人，那台灣卻恰恰相反，一直在壓抑這樣的數字，只有百分之零點五到百分之一，這等於是一個政策的排除，他用種種的方法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譬如說他自動認定你只要是18歲以上你就必然有工作能力，有工作能力就必然工作收入；又譬如認定你有家戶，你是一個異性戀的家庭，你下面的小孩就自然會扶養你等等。

作了很多這樣的認定去排除，老師也提到說這樣住宅商品化，一坪的概念，一坪很小，可是一坪，卻在有心人的炒作成為得到暴利的工具，但是一坪也是我們很多人，這樣的一坪之下，他可以獲

得隱私權，所以一坪真的是差很大。那我們接下來歡迎台大城鄉所的黃麗玲老師，黃麗玲老師，她是都市空間政策的專家，她也很強調：一個社區或是一個城市的空間設計，應該是為了一個城市的居民而設計的，她也強調社區參與空間規劃的這樣一個概念，那我們請黃老師。

黃麗玲：

謝謝主辦單位邀請，謝謝大家今天來，讓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有許多人關心。我可能已經是落後在時勢之外了，我想今天從整個都市發展的角度，提供一些觀念跟大家交流。

都市成長誰受害？我想談一下台北市地產上漲與社會隔離的現象。從都市規劃的角度或是都市政策的制訂來看，城市成長往往就是一個地方政府的目標，有時候大家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可是台北市這二十幾年的發展，我們越來越發現城市成長總是有受害者，可是這樣的問題很少被談，主要的因素我覺得是地產在裡面扮演的作用。

所以我想先用幾個數字跟大家談一下，其實我一般很少用這樣生硬的圖表，但這幾個數字其實是台北市去年發佈的新的統計數字，非常有效地幫我們看到一些現象。

我們看一下從民國89年也就是2000年開始到去年的發展，失業率大幅攀高，從失業人口我們看右邊這裡，從原來的千分之30攀升到75，失業率升高了一倍。我們看一下就業者的從業身份，這個指標常被忽略，但是我覺得它意謂著老闆之島的消失。因為我很久以前曾經有參與中研院謝國雄老師一個計畫，做他的研究助理。謝老師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boss island，就講台灣作為一個老闆之島，因為台灣經濟成就在一九八零到九零年代，中小企業的經濟角色重要，創業機會非常多，非常容易成為老闆。可是我們看從2000年，最近十年當中，受雇者的比例越來越高了，其實意謂著，今天出社

會能夠當老闆機會越來越少。為什麼？我認為跟資本的競爭，資本的規模越來越大有關。再來我們看一下大專以上的失業率曲線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失業率十年來也攀高了，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專以上的失業率所增加的比例要高過失業率增加的比率。意思是說高學歷失業，如果我們將大專定位於為高學歷，高學歷失業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王老師也提到的低收入戶的增加，我們看萬人的低收入戶人口數的話，從左標來看的話，增長也是將近一倍左右，那當然市政府會強調補助金額增加等等，不過我想剛剛王老師也提到這幾個政策的一些問題。我想加進來的面向，就是在剛剛講的那些經濟狀況越來越差，失業率越來越高，不過台北市本身的所得成長，並沒有呈現出那麼大的落差。我接著想指出另外一群人，就我而言是一種自力救濟指標，也就是生不起與不想生的社會。我們看嬰兒出生的人數，這數字非常可怕。從2003年政府警覺到嬰兒出生的人數很少，會變成國防問題。國防問題不是對岸打過來我們沒有人上戰場，而是整個勞動力短缺，而社會經濟體制無法順利轉型。例如我們現在看到日本的狀況，會成為很大的問題。我覺得主要原因是社會所給予的支持太少，以至於年輕的夫婦，願意生育或是能夠養得起的能力越來越低。如果你看調查的數字，理想生育數大概都還是兩個，但是實際上真正生的數目只有一個，這不是現在國家政策說，看到小彬彬很可愛啊，或者是給一百萬徵求聽了就想生的標語就能解決的，這是整體社會政策的問題。

相對於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些數字，經濟狀況越來越糟，有一個數字，卻很明顯的告訴我們，當土地地價上的價格波動，在過去的十年成長得非常快。我們看公告土地現值的總額，從公元兩千年的14兆多，到了今年的市價總額已經變成是16兆多了。我覺得是這樣：台北市雖然看起來整個經濟在擴大當中，但很大一部份是從地產而來的，地產的價值其實某個部分就是地主與一些房仲業從中獲得利

益，但成長所得並沒有產生公平的分配。那有個好問題是：為什麼政府支持地價上漲，即便在最近已經累積了很多民怨，希望我們從中央政府能夠來打房，但吳敦義行政院長所提出來，主要的方法是叫大家離開台北市，到林口或是更遠的地方，地價就會比較便宜，比較負擔的起。相對的，租稅的手段其實端出來很少，沒有要打房的意思。

為什麼支持地產上漲？我覺得有幾個可能，第一個雖然我們說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知識與金融經濟是很大的一部份，但其實在亞洲的主要城市裡面，地產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這個研究上是被低估的。以台灣來講，其他各縣市的地產相對的因為沒有掛上所謂全球化的網絡，相對的地產的價格其實是往後退、減少的狀況。但我們台北因為產業，包括金融或高科技產業都地方政府政策工具有限，變成政府相當依賴房地產的產業來提振經濟。

另外就是稅收來源，地方稅、房價、房屋稅、地價稅大概是台北市比較能夠掌握的稅收來源，其他很多都是靠中央政府。尤其地價稅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中佔了地方財源很重要的一部份。除了稅收之外還有政商聯盟，每一回在選舉之中，政府要端出所謂的政策來的時候，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在一九九零年代晚期，有短暫的市民參與的風潮出現，但過了兩千年以後，越來越多的市政，市長選舉等等的政績層次，又回到了以往的大建設取向。大建設，其實需要很多建商的合作，例如說台北巨蛋，雖然說監察院的風波下來，暫時不知道要往那邊走，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遠雄如何成為北台都會區，不只是台北市，也是台北縣、台北市、桃園這些地方，想要積極爭取拉攏的房地產對象。

另外一個就是社會迷思，政策制訂者會那樣想，某個程度上反映了我們主流社會的想法。手上有房產的人，希望房地產一直漲，甚至你的房子是自用住宅，你就那麼一個單位，也不能賣掉，可是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那個錢雖然看不到，每天睡覺前想像那個數

airiti

字上漲，就覺得我賺錢了，心情就變成愉快多了。有土斯有財，所有的財富累積在房地產上，社會的迷思是在的。

另外政策也哄抬房地產上漲。就台北市過去幾年大型的都市開發取向製造了一個幻覺，讓我們覺得台北市還在不斷成長。它製造了一個現代化的進步城市，全球城市的意象。例如說我們的內湖的高科技園區，或是我們新增的消費地點，像美麗華附近，或是最近開幕的京站等等。這些很大規模的房地產，很多牽涉到所謂 BOT 的方式，政府提供了很多土地或其他其實是社會共同資源，投注在私人發展這個事情上。

第二個也很明顯的現象是出售公有土地，雖然最近國有財產局做出了大型國有土地禁止標售的決定，因為實在是太多人罵了。但是國有財產局，其實值得大家更積極的注意與批評。政府手上曾有許多公有土地，無論是都市地區或是非都市地區，是都市轉型、產業轉型可以用的工具，但國有財產局要不是不積極利用，要不就是賣掉土地。例如若政府要做公有住宅的話，為什麼不把市區裡面一些好的地點拿來興建社會住宅或是公有住宅呢？大家可以看到市政府說他們已經打算把三塊地作為公有住宅出租，鎖定給學生族群、銀髮族群等等，可是價錢到底怎麼算？價錢算的是說租金打八折。我覺得不會是一個有效的政策，因為那個租金的幅度還是非常高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個政策決議出來之後，我們看到報紙上的報導，許多的財團是沒有意願的，因為做這個案子不會賺錢，出租不會賺錢，他們心裡想的是怎樣可以賣房子，賣掉。

所以住宅政策是需要政府的資源跟土地的投注，甚至如果政府把國有土地賣掉，應該把相對的資金拿來投注於公有的住宅，但是現在不是，地賣掉了，那錢到哪裡去了？其實不太清楚。第三個就是都市更新，這大概是台北市過去十年最火紅的政策，我2002年博士論文寫的是台北市與香港都市更新的比較研究，不過兩千年寫完以後到現在，幾乎出現了完全不同的形勢。我當時的結論是說，其

實台北市不是那麼急著把進行拆除式的都市更新。它當時跟中央是有差別的，中央想要把土地商品化，積極的把房地產帶進來，但是台北市當時還有一九九零年代殘留的民間與社區的壓力，所以都市更新的取向是希望公有土地朝公共綠地等來發展，台北市的事務官當時沒有那麼清楚的向中央表態去迎合都市更新政策。可是現在不是了，最近已經在提二點零的容積，完全贊成土地商品化的價值。

看下一張投影片，我把這個過程稱為是一個新的圈地運動跟社會排除的出現。中央政府的建設取向造成土地商品化與居民的遷移。第一點看到的是中產階級在台北買不起住宅的狀況。以前我年輕的時候會覺得好好唸書，最後在學校找到一個夢想中的工作，我以前認為教授是一個讓自己安穩生活的身份，但後來覺得好像不是。如果你要養上一代還有下一代又要付很高的房租時，其實每個月省不下什麼錢的。第二個現象是中下階層租不起，大家可以看到台灣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也就是相對於房屋的價格其實租金算是很便宜的。所以有人說你寧願租不要買，但是重點不是在於租金便宜，而是在於房子的絕對價值太高了。我們看這兩天阿扁，不好意思提到他，可是他的例子很好用，他在曼哈頓買的豪宅，大家知不知道多少錢？五千萬，在曼哈頓，五千萬的豪宅？五千萬的豪宅在台北，勉強也算，可是你算一下紐約的相對所得水準與房價比等來看，台北的房價是很高的。所以中下階層租不起。最後還有一群我稱之為加倍弱勢的族群包括違建戶、都市原住民、遊民跟街友。

今天台北有與我們主題相關的其他活動，例如像我們三鶯的朋友們有一個反迫遷的動員，然後晚上，等一下六點半，是全省農民的動員，反對政府徵收土地，政府為什麼要徵收土地？因為土地就是到了財團手上，去做他們所謂很有價值的經濟轉型的開發，但事實上有多少的生技園區的土地晾在那邊？有多少的所謂園區的土地沒有被利用？但是政府仍不斷的徵地，到底是怎麼回事？街友的議題，今天大家都有提到，我就不再多談。

在這個過程當中，除了前面的商品化之外，我們看到文化跟社會的現象。我想指出都市更新跟社會排除，第一個是更新後豪宅的地景，剛剛王老師也有提到原本鄰里的關係可能很緊密，人際的關係也在。但是更新以後整體的社會關係其實被重組過，重組過以後的方式，是按照你的經濟能力下去重組，原來台北市這一二十年已經很清楚了，以後會慢慢演變成看你的地址就知道你是不是有錢人，這跟英美很多地方的狀況是一樣的。

第二個是文化行銷跟街道控制，我的朋友告訴我在萬華，艋舺的電影上映以後，為了要有更多的觀光客能夠去領略萬華的風情，所以街頭掃蕩的狀況增加了，掃蕩的對象就是街友就是流鶯，為了要呈現出台北的文化的意象。第三是設計的排除效果，我們只要去隔壁看一下很多街友拍的影像就可以看到，例如「可恥的公園座椅」。我秀給大家看幾個案例，從一九九零年代到現在：14、15號公園的案例，現在變成京華飯店綠草如茵的樣子。接下來是大漢溪撒烏瓦知部落，撒烏瓦知是我看過都市農業、社區營造，非常成功的一個案例，可是前面自行車道開過去了，就從人家經營了三十幾年的部落這樣穿過。

這是大家很熟悉的龍山公園，龍山公園很奇怪的設計，不只是人體的配置，還有椅子的設計，據說是要呼應廟埕的想法，但是這個用心良善的都市設計者大概沒有想到，最後會變成這樣一個排除式的例子。我自己在龍山公園，一邊看到是剛剛那些排除式的例子，一方面這個公園在排除式的設計裡面，很多很有趣的活動仍然在發生，讓我們覺得，對都市公園除了現代化之外還有一些想像，例如說左上角的圖，看起來街頭藝人好像是cosplay，然後左下角是那卡西的演奏等等，或者是這種廟會表演的儀式，都是在我們其他現代的都市公園不會常常看到的景象。

最後一個問題是，那我們怎麼做？

左邊看到的是1989年的無殼蝸牛上街，兩萬多人夜宿忠孝東路，有人說無殼蝸牛夜宿之後，也沒什麼效果。但是我們當時為了怕這樣的狀況，而成立了兩個團體，一個是崔媽媽、另一個是 OURS 都市改革組織。當然一路風風雨雨過來，很多事情我們可能無力扭轉大的政策，可是在很多小政策上仍然起到一些作用。那麼最後我建議怎麼做？第一個，例如我剛剛講的，弱勢的、中等階級、中下階級，以及加倍弱勢的階級，在土地商品化過程中都是受害者，我們怎樣共同看到這個問題？第二，就是制度內與制度外的政治動員。例如說，可恥的公園座椅。我看完攝影展就在想說，至少是有個事情，是大家可以做的，就是連署至公園路燈管理處，然後直接寄到市長信箱，市長信箱不理你，就直接送給各個委員會，因為的確很可恥。台北市政府講文化包容的政策角度，卻還能夠容許那樣椅子的出現？而且覺得不好的，應該不只是街友而已啊。情侶坐在上面試試看好了，大家都要溫良恭儉讓對不對？

第三個，我覺得還是回到文化上的課題，剛剛跟瑜慧討論了一下，我也覺得是這樣，因為除了政治動員之外，我們要去處理社會上文化排除的這個議題，讓有一些在弱勢中不被看到的聲音能夠發出。讓被弱化的族群能夠進入論述。例如國際移工大約從十多年前開始被看到在文化上發聲權，所以移工的形象變得比較完整，市民從人性共鳴中可以得到連結，而不是另外一個永遠沒有辦法被接觸到的族群。我覺得今天的攝影展就是促進這樣的文化理解，讓沒有被看到群體可以被看見，謝謝。

戴瑜慧：

今年很重要的一個主題是：買不起、租不起，剛開始我們會買不起、租不起，剛剛老師有提到，地價上漲三倍，然後物價也一直上漲，像阿春姐還有很多朋友都是去舉牌子，舉招牌，他之前的價格是900，然後一路往下跌，850、800、750、700，最近我們又接到消息已經跌到了650，650已經是違法了，違反了基本工資的保障，

真的是租不起，接下來我們請阿春姐分享，「可恥的座椅」也很多是阿春姐拍的。我們請阿春姐跟盈靖一起來分享，遊民勿入的社會排除經驗。

阿春姐：

歹勢喔，我不會說國語，我用台語說。你看這公園的椅子怎麼坐吶？屁股都被椅子給卡住了，怎麼坐？每個公園都這樣，台北都這樣，我們人不知道該怎麼辦，看到那東西真的很……。

郭盈靖：

阿春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初為什麼想拍這些座椅的部分？

阿春姐：

這些拍下去就要給人看，公園不能這樣做，看到這樣，我覺得很不捨，那麼漂亮的椅子，被釘成這樣。

郭盈靖：

那麼以前有這個狀況嗎？就你的觀察，是哪個時候開始這樣情況的？

阿春姐：

很久了，很久以前就有了！我去公園看到，就拍下來給大家看阿！

郭盈靖：

阿春以前也有一段時間在龍山公園那邊，請說一下當時在那邊住宿的情況，還有當時你看到那個椅子的時候，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想要分享的部分。

阿春姐：

大家看那個椅子坐也坐不舒服，睡也睡不舒服，我看到大家都坐的很難過。對，以前沒這樣，一開始的時候很好看好漂亮的，後

來被釘成那樣，被釘成那樣你看！我就拍下來給大家看！你看我們都沒有房子，所有的家當，都要放在公園裡面，就像無殼蝸牛，艱苦人就是這樣阿！這就是艱苦人，咱們在說的艱苦人，就是我們這些遊民，沒有地方住，要租房子，怎麼租？租不起阿，租不起我們怎麼辦？就去睡公園、屋簷下、涼亭下，四處睡。這是我的家當，沒辦法呀，租不起，去睡亭子下，家當在這裡，這就是我睡的地方！這裡是公園！

郭盈靖：

阿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家當對遊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但是譬如說放在街道上，一般的人就會覺得他是一個垃圾，隨時會想把它清理出去。但是對於遊民來講，例如說棉被、睡袋等等是他晚上要睡覺非常重要的保暖工具，我記得像阿春這個推車，一層一層的，裡面包括說例如鞋子，他要去工作用的工作鞋也在裡面，其實每天都要拎著，你到哪它就要跟著到哪。

阿春姐：

對阿，這是我的家當，我走哪裡，他要跟著到哪裡，跟著去哪裡啊！我沒地方住，就需要這樣啊。你看，就弄成這樣。

郭盈靖：

為什麼要你去哪裡家當就需要跟著你到哪裡？為什麼不能你今天睡在公園，白天就把它先放在公園，你自己去其他地方工作完，回來再拿？可以這樣子嗎？

阿春姐：

這樣不行，這樣會被人家當做是垃圾丟掉。那我晚上不就冷死！冬天的時候會冷死！這裡就是我之前睡的地方，雨傘，我們的家當，晚上在這睡，才放著。

郭盈靖：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睡在亭子下，曾經有什麼樣的遭遇？

阿春姐：

睡在那，就被人趕阿。趕來趕去，街友啊，被踢來踢去，像球一樣給人踢來踢去。睡在這裡不行，睡在那裡也不行，做人真的很艱苦！艱苦人！

郭盈靖：

這一張照片放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就是說接連這個主題，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有一個監視器，右邊可以看到是一個社服機構。這個監視器應該是這一兩個月以後才有的，我自己本身在這個機構做社工，有一天我的同事忽然就跟我們說我們外面最近裝設了一個監視器，我就說，路上每次就會有很多監視器阿，他是照路吧，他說不是，最近我們的大門口就有一個監視器，正對著我們社服中心的門口來照，我就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有個監視器就正對著街友中心的門口，在前幾個月才開始這樣子。那我們問說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做？說真的他也沒有跟我們說，沒有跟機構說，要在這裡架一個監視器。

長期以來，遊民機構在社區裡面被排除的非常嚴重。在這個情況下，我們也沒有辦法很據理力爭的方式，去說他侵犯到了人家私人的隱私。機構也只好想說，沒有關係，這就當作，是幫我們守望相助、維護治安。可是很明顯的，他就是將這機構當作是一個犯罪的地方，需要有一個監視器，讓他隨時可以蒐集，看看你這邊的情形。因為我們那邊每天有遊民來領便當或是盥洗，所以聚集了一些遊民。例如我們今天這樣聚集，他會說我們是一堆學生，一堆知識青年，是來學習的，但是如果今天這裡滿坑滿谷的都是遊民的話，這裡就會被公布出去：這裡永遠都是一群遊民在聚集。而裝監視器的情況，機構也不能怎麼辦，就只能放任他這個樣子。

問：誰裝的啊？

這個應該是里長跟警察局裝的，過去，他們會說，機構設在這邊，會造成附近國小的危險，可是說真的國小離機構只有兩條街遠，再來，我們有跟他們說，如果造成了國小的危險，如果有任何犯罪的事實，要以個案處理阿，任何人有犯罪事實，都是以個案處理，而不是說你完全排除一個機構在這裡。甚至，我們去掃公園也會被轟出來，因為他會說：如果你把公園掃得太乾淨的話，遊民聚集越來越多怎麼辦？所以說其實像阿春剛剛跟大家分享的，其實心裡是蠻沈重的，隨時那種恐懼、那種排除，是透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種方式，去把這一群人排除出去。

又例如說今天有個報導，昨天台北車站開會，說市民滿意度最低的部分是廁所，說廁所因為太老舊了、太髒亂了，於是說決定花三千萬元打造一個五星級的廁所，就有一個記者打電話來問說，他覺得很奇怪，在開會的場所他們討論說，一旦如果五星級的廁所建了之後，台北車站有一堆的遊民，如果遊民要去使用的話，如果弄髒弄壞了，會不會打壞了原本要建設是五星級的廁所的美意。這個的新聞今天有出現在例如中央社、聯合報等等，這個部分等等可以在接下來的時間可以討論，那我就先介紹到這邊。讓我們謝謝阿春。

戴瑜慧：

就連廁所還沒蓋好，就開始在擔心遊民去使用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這排除無所不在，接下來，開放針對這一場的主題，有沒有什麼要討論的？

第一場討論

與會來賓：

我有一些問題不是很清楚：剛剛有提到政府的一些對於遊民的政策，但我還是不夠清楚，有哪一些政策是幫助的？或是，你剛剛說的，如果有一群人睡在公園，把他們趕走是合法的嗎？他們沒有睡在公共空間的權利嗎？第二個就是，現在台灣有什麼地方是遊民

遇到困難可以求助的一些政府的機構或是民間組織可以幫助他們的嗎？謝謝。

王增勇：

我不是很確定我是不是夠瞭解目前最 **update** 的關於遊民的政策。我想現在政府的政策是，我們現在有所謂的遊民收容中心，然後是可以安置，也有公家經營的，政府也同時有委託一些民間團體，他們提供一些收容，有像社服單位，像救世軍，他會提供中餐與晚餐，然後民間團體像是創世基金會，有一些民間團體會在那邊有一些工作站，我想勞工局也有提供一些臨時的就業的方案，但是這些政策到底有沒有辦法真正的幫助遊民能夠在就業的市場上面慢慢的往上？通常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我們的以工代賑向來就不是以提升人力資本，作為一種職業訓練，向來就是把他當作是一種懲罰性的，因為你來領政府的救濟金，所以你必須付出你的勞動力，你其實很難能期待，有一個人去掃馬路，能掃出個專業來嘛，他很難會成為所謂的就業人力資本？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其實社會的懲罰性遠高於就業的輔導，至少他所宣稱的功能。那我不知道在其他的政策上面，也許像瑜慧或是盈靖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補充？

戴瑜慧：

這位朋友問的問題其實非常的龐大，基本上政府在收容、就業、和驅趕的部分，他其實一個概念就是：我輔導你去就業，那你去就業，就不會是遊民了。但是你看多少年都是這樣搞的，他就把你送到派遣公司去做清潔工，臨時工就是不穩定嘛，很快又回到這樣的狀態。另外一部份，他提供少少的收容機構，這收容機構是大有問題的，所以很多的遊民朋友都不願意去，但就變成媒體或政府說：你為什麼不去呢？明明就有收容機構在，你為什麼不去住？所以收容機構也是一個很大要去檢討的問題。另外就是驅趕，就是不停不停的驅趕，但是其實大家也都知道，要趕到哪裡阿？要趕快哪裡？盈靖更清楚知道政策部分，請他簡單的回答。

郭盈靖：

針對驅趕的這個部分，我覺得現在整個台灣社會對於遊民可不可以公共空間，多數人他們覺得驅趕是合理的。就是說，他們覺得遊民在公共空間，或是露宿街頭，一個是犯罪率的問題，再來就是製造環境髒亂的問題。因為這2個問題，他覺得說，不能容許遊民在街頭裡面。有兩個反駁：如果是犯罪率的問題的話以警政或是研究報告都指出來，警察也自己證實了，遊民的犯罪率極低，這個假設是不存在的，遊民不是一個犯罪者。

如果說是製造髒亂的這個問題好了，其實他製造髒亂，就我們的觀察，那只是少數的遊民朋友，他可能例如說破壞了環境，但是破壞環境的事情是不是就只有驅趕的方式？而或者是說你是用其他種的方式，例如說建立了某一種機制，讓他可以去符合的使用。例如說昨天蘋果日報問我說，如果不驅趕他，他留在那邊，就放著讓他爛？就現在有兩種聲音，那我跟他講說，一個五星級的地方，號稱是五星級，可是他只是硬體上的五星級，台北市號稱是一個進步城市，你應該想說，在這一個進步的空間裡面，所謂的進步是可以包容所有不同的人在那裡，那今天這個五星級你把這些艱苦人都趕出去，那你是不是覺得說這個車站只有有錢人，或是你要穿得西裝筆挺的人才可以進去？其他穿得破破爛爛的人都是不可以進去的？我覺得很重要的問題是在一個公共空間，有沒有包容異己存在？不管是遊民，不管是外籍移工的朋友，或者是等等的弱勢的人都可以去使用。

與會來賓：

驅趕有法源依據嗎？還是他個人的判斷？

郭盈靖：

現在台灣的狀況是，他不管遊民有沒有犯罪的行為，只要你露在街頭，他覺得你是遊民，他就把你趕走，他是依照你的身份去決

定，沒有什麼法源的依據，頂多社會秩序維護法。或是他要臨檢的話，像過去警察機構到社服機構，要求要把每一個人登記造冊，我就說，你這是違憲的！那另外一個問題是說，像台北車站這個問題阿，他強調五星級，裡面提供特殊使用者的需求，例如說：行動不便、長者、親子，等等的多功能廁所，也有在 B1 提供不同的旅運量，就是說提供女廁所讓他搭配的環境舒適一點。

我記得，台大城鄉所的畢恆達老師他就有寫過說，過去的建築是形隨機能而生，也就是說，是依空間裡面的人要使用的需求，設計不同的空間配置。那我覺得，我們必須正視的是，公共空間必然會有遊民的存在，全世界也是有遊民的存在，國外也是會有遊民的存在，你為什麼不能夠，我們也有跟遊民朋友討論阿，爭議點例如說遊民會去洗腳，將腳移到洗手台上，那你為什麼不設計一兩間符合遊民需求的盥洗室，也不見得只是遊民會去使用，例如很多坐車的旅客，他也許北上來找工作，他們也可以去使用阿，也許你說浪費水費，那麼收十塊十五塊我覺得這都 OK。而是說，你真的有沒有辦法去符合到你當下的每一個族群，他在裡面，你設計那個機制進來讓他去使用，如果說他違法，再違規的話，你再把他們驅趕嘛。我覺得政府或是台灣社會各方面都該去正視到有一群底層勞動者，他現在變成是遊民，而且，現在人人都有成為遊民的高風險群，你不能再用這種排除的方式去處理。

與會來賓：

遊民大部分有工作，但是他們的薪資不夠他們去過一個比較正常的生活，剛剛老師有提到說北歐國家政府給的補助。那像勞苦網有報導，今年一月有遊民去勞委會抗議，好像是關於補助的部分，可不可以請你們講一下，關於政府就業補助政策，還有一些就業輔導方式

戴瑜慧：

謝謝你提出的問題喔，幫我們自然而然的導入第二場的主題。第二場的主題就是遊民做為一個底層的勞動者，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政府老是說他有一個就業輔導政策，到底這些政策的成效如何？之前有一個年關方案，因為年關要感到溫暖，但是這樣的政策是有用的嗎？為什麼遊民行動聯盟去抗議了？我們接下來可以討論。

前面有飲料還有餅乾，那麼我們休息各兩三分鐘好不好，讓我們把椅子調一調讓站著的朋友可以往前坐，那兩位老師如果可以繼續留，我們可以繼續的討論。我們謝謝這一場的與談人王增勇老師、王麗玲老師還有阿春姐，謝謝大家。

第二個主題：遊民與底層勞動者

影片播放《街友舉牌實錄》

戴瑜慧：

那我們漂泊新聞網就是蓋簡單啦，也蓋古錐。他的出發點就是某大報全版四則的關於遊民的報導，佔據了二版的全部，有一則就是關於遊民舉牌，但是，是一個錯誤的報導，他把裡面的舉牌八小時一天的薪資講成是三百塊，還說三百塊是一個很不錯的價錢，遊民拿到以後可以去買一個便當兩瓶米酒，當時大家討論就覺得心情真不爽。

第一個他講的三百塊，你除掉八小時，等於一個小時只有38塊，他的認知裡面就把你的勞動價值給低估了，大家知道舉牌站一天那是非常非常累的，一小時38塊是嚴重違反我們的基本工資，表示那個記者概念裡面就覺得阿你這樣子一天只值300塊，第二，誰告訴你拿到錢是去買米酒阿？像我們阿春姐一個月就在等這個八天的舉牌的錢，那個錢一分一毫都要攢起來的。像來上我們攝影班的課，來工作坊的時候，我們有些朋友為了省公車錢，都走了四五十分鐘，走到攝影班，一塊錢都是那麼不容易的。

為了抗衡這樣錯誤的，污名化的報導，所以逼不得已，我們才開始做這樣子的另類媒體的實踐，這一場主題我們要談的遊民，作為底層勞動者的處境，我們首先歡迎中華電信工會的理事長，朱傳炳理事長，歡迎。

朱傳炳：

我們台灣是一個很奇怪的島嶼，政治分配所有一切的資源，討論一件事情只要意見不同，你就說他是藍的，他就說你是綠的，造成整個台灣好像都不是理性的。最可惡的是，藍綠都沒有勞工政策，這是我們勞工者最悲哀的一件事情，加上資本全球化之後，很多利用高科技的，就是我們電信的網絡之後，他把所有需要勞工的移走到任何一個最廉價勞工的地方去從事很多的經濟活動，造成說原本台灣就業市場是很多的。但政府發言人他會告訴大家說台灣的勞工不吃苦不耐勞的，就引進外勞，引進外勞之後，又嫌不足，弄了一套派遣工，學日本泡沫經濟化的，好的不學的學這個。

所以派遣工加上外勞的政策之下，台灣的勞動條件直接往下降，什麼都漲，土地也漲、房價也漲，什麼都漲，就是薪資不漲，不漲沒關係還要往下降，現在所有工廠，如果你有機會、幸運的在工廠謀得一個職務，大學畢業一個月兩萬塊很幸運唷，然後他不給你加班，但是給外勞加班，外勞的配偶再加上本勞的正職員工的時候，比例逐漸下降，勞動條件越低，他所告訴你說，你這個工作，因為本國的勞工沒辦法吃苦耐勞，外勞跟派遣工好管理，用這個口號這個理論，剝奪了所有勞工的勞動條件和謀生的機會也就這樣一直往下降。

如果今天你們舉牌拿到800，他說我工廠的價碼已經不在800了，所以他會一直往下往下往下壓，他告訴你說勞動市場是自由市場，是可以比較的，這個是我們所看到最痛心的。如果有些社團來幫助遊民或是其他弱勢團體的時候，掌握資源這些的勞委會、社會局這些政府官員，他是因為他看到你的喜好，如果你是跟他同樣喜

好是藍的，藍的在執政的時候，是對他有幫助的，你們申請補助的時候很容易，如果你們不是共同喜好的，政治信仰一樣的，你的補助申請就刁難幾次了，假借合法的程序讓你完成他所謂的要給你私相授受的問題，表面上都是合法，合情造物的，如果你不聽話的就是沒有糖吃，聽話的就乖乖的，最後他所做的決定，都是為未來的選舉，不管是五都選舉、總統選舉來做考量這一批的人對他有沒有幫助，最後還是繞到了最後的政治鬥爭來分配所有的一切，這就是勞工才是最可憐的。

如果你是越低層越沒有水準的，他認為說你不要破壞他的形象，他根本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馬英九他大概不會跟我們街友站在一起拍照。如果這種情況越發展下去的話，讓社會上覺得說你工作底層的因為沒有大官跟你站在一起合照就提不起你的身份地位的時候，他會越來越告訴你說，你這些人是越來越危險的一群，沒有人愛，社會媒體如果有風吹草動，就把底層的人當作是飢貧起盜心，是治安的死角，是治安的溫床，把他污名化。

在很早期，二十幾年前的新聞報導，直接報導在新公園什麼事件，就是遊民所為，一直報導報導，渲染的過度以後，讓我們覺得遊民就是會造成很多問題，讓人家害怕，媒體的報導讓大家心存撕裂的時候，對這些遊民不會感到他們是有可憐之處、或是可愛之處，都是覺得少接近為妙，在早期的。

當然，我們是勞工，在受薪階級的時候，我們又分藍領白領，白領的階級又好一點，所以白領認為說他看不起藍領，而藍領看到街友又覺得他們少我一層，又把層級分化了，之後勞工永遠沒辦法感覺到自己是受薪的勞工，本身就沒辦法合在一起，被分層之後分化掉了我們本來都是勞工、受薪階級的力量。

在這之前我們電信工會沒有接觸到所謂遊民事務，因為我們在勞工界的時候，我們可能有些朋友覺得自己是白領階級，因為他薪資高、待遇好、福利好。我們工會又很強悍。

後來我們反過來看，我們員工有沒有這種慈悲心，經過他們身邊的時候有一絲一毫的尊重他們人權的心理，我們發現很少，因為我們沒有去教育我們這些員工，告訴底層的員工你今天因為有工作做，是好的一件事情，要珍惜這一份工作，那沒有工作的時候，他們應該尋求幫助，那現在我們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瞭解，他們同樣有受薪有工作的，但是他們的薪水竟然付不起他的房租，如果付得起，那就沒辦法付得起他的伙食，兩項沒辦法齊全，食衣住行沒辦法一次包到底。所以這個是他在我們台灣有工作，但是為什麼會出現最基本的生活條件都不能符合要求，他也沒有奢求到什麼，他沒有說要吃好的穿好的，他只希望每天可以過著溫飽的生活。

這些我們以前都想不到，接觸到這個之後，我們才曉得還有這種情況，以前都認為他們都是無業遊民，所以才叫做遊民，事實上現在不是了，現在有工作也參與到這部分，沒工作的更慘，這個是一個。而政府沒有勞工政策的時候，早期我們是為了失業勞工，為了要顧飯碗而走上街頭，一直向政府喊話，要他要有勞工安全網，希望不要製造勞工有失業的窘境，所以我們每年都在上街頭都要求要顧飯碗，要他保護我們勞工沒有失業發生，要把失業率降低，可是因為勞工在政治板塊上是沾不上邊的，政治分配的一切結果，藍綠都不會看顧所謂的勞工，他只要在選舉把你當成投票的工具，選後就不會再甩你理你，這就是勞工朋友的悲哀。

在這種前提之下，我們在接觸遊民的時候，我們唯一的能夠，除了向政府一直要求一直喊話，我們希望能跟周遭的朋友講說，遊民他們也是有尊嚴的，只是因為這個環境造成的，政府有沒有疼愛他們、照顧到他們，不管是福利政策、不管是勞工政策，都沒有眷顧到他們。甚至官員在處理事務的時候都用找麻煩的心態在處理他們的事務，不再出現官員是用愛心的，他也不會說眷顧這些人，所以整個來講，好像他們被遺忘被排除，逐漸的成為社會所謂的邊緣人，讓他們覺得什麼好處都沒有，壞處一堆，污名化扣在他們身上，

永遠讓他們覺得抬不起來頭。所以一直在這個情況之下，遊民他心就沒有自信，沒有自信所以就沒有勇氣，所以他不可能去做大奸大惡，因為他沒有權力，有權力才可以貪污舞弊。

但心理上他又覺得好像對不起家庭，沒辦法光宗耀祖，所以他不敢在街上拋頭露面，所以他哪來的勇氣再去犯罪？所以現在的遊民比以前的更沒有勇氣去犯案，以前的還可以說他們可能沒辦法吃沒辦法睡就去偷去搶，大概現在他們連去偷搶的勇氣都沒有，所以他怕，越往下去，所以能不能夠再重新拾回他們自信，除了政府要提供好的工作機會以外，真的照顧他，讓他能夠生活的能夠吃飯，我們很期待這個部分。所以電信工會希望要重頭開始來認清，除了結合政府的政策，來看看我們遊民朋友他們未來後續的發展，我們也希望長期的關注這一塊，使我們比較安逸的勞工能夠關心，就算你沒辦法實際的幫助，在精神上眼光上也要給他一個尊嚴、尊重的看待，我的報告到此，謝謝。

戴瑜慧：

團結力量大，不同勞工團體站在一起，特別是跟底層最受壓迫的最深重的朋友站在一起，是最很重要的，這也是我們為什麼五一去參加勞動節遊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接下來歡迎郭盈靖為我們做報告，那我們右邊其實有我們那時去遊行舉的一些標語，他們也是在那裡做標語做的蠻開心的，當時在想那些標語的時候，也是把自己的心聲講出來。

郭盈靖：

大家好，我今天要從勞動的面相來探討說現在台灣遊民勞動的狀況，取名叫看不見的勞動者，希望之後漸漸的遊民的勞動狀況可以被大家看到。

提到遊民，大家認知到的遊民通常是一個危險的份子，他就是會破壞社會的秩序，如果民眾或是社區居民經過的時候，會造成治

安上的許多隱憂或是危險，或是說覺得遊民他露宿街頭就是一個犯罪的人，可是遊民真的是犯罪的人嗎？我們從這一則新聞看一看，之前有一則新聞標題寫說金門新城爆遊民性侵女童案，當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就顯示出有一個性侵的案件是遊民所做的，就開始強化了遊民是一個犯罪者的形象，但是我們仔細看裡面的內文，第一段就是寫說有一個眷村要改建之前廢棄在那邊，有許多遊民在那邊露宿，製造那邊的髒亂，有一天有一個女童被拉進去性侵，但是裡面的內文寫說當警察單位去瞭解實際的狀況的時候，發現裡面並沒有遊民生活的用品，例如棉被、睡袋等等的東西，再往下一看，住在那邊的居民告訴警察人員或是去追查的人說，其實案子發生的時候是沒有看到遊民出入的。

這則新聞，剛開始看標題再仔細看內文的讓我產生了很大的震驚，就是說：整個社會往往將遊民塑造成是一個犯罪者的形象，但是其實這個案子是誰做的現在還在盤查之中，可是就先認定了遊民是一個嫌疑犯。一般大家往往會覺得遊民是犯罪者，可是警察或是研究單位指出遊民的犯罪率其實是非常低的，不過就是長期以來整個社會強化遊民露宿街頭，就是一個犯罪者的形象。那麼除了遊民是一個犯罪者的形象以外，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遊民是懶惰、不工作的人。

我們之前有看到一則新聞，就是有一個清潔公司，他在街上抓了許多的遊民，抓了之後，在台東那邊招攬清潔工作之後讓遊民去做，把遊民軟禁在那邊，提供三餐還有幾百塊的零用錢，把遊民當作是一個廉價的奴工來使用。這個新聞其實不是一個個案，像我過去在接觸上面，曾經有一個雇主打電話來社服機構跟我講說，我們在某地區要做一個農場的開墾，現在需要幾個臨時工幫我們來做這樣的工作，我就問他說薪水要怎麼算，他就說現在是初期，是入股的階段，所以我們現在是幫他找幾個遊民過來，他就當我們的股東，我們這裡可以提供他吃住，我問說有沒有薪水，他說我們會給他生

活費，一個月大概一兩百塊吧，我想說你是在裝瘋子嗎，人家幫你做事阿，我就問說股東的話要做什麼樣的事？他就說開墾農地、清潔、廚房助理等等的工作。

又有曾經有搬家公司，一早當你的機構門打開的時候，他就會進來說我們等一下有一個搬家的的工作，要做一天，你們這裡有沒有遊民要去阿，一天五百塊。可是過去我搬家的時候都給人家一兩千塊，怎麼會只有五百塊？我就問說為什麼是五百塊？他說「唉呀，遊民有工作就好了阿，反正平常坐在那裡沒事，讓他有個工作總比沒有工作好」所以給大家看的新聞還有剛剛講的這個，其實都反映了社會上對於遊民的認識上面都認為遊民是一個懶惰不工作的人，所以今天我們只要給他一個工作去做，讓他脫離遊民的身份，不會去管說遊民去工作時的待遇，這個工作是不是有保障，或是說其實這都不是重點，反正覺得給遊民一個工作才是重點。

至於他的勞動，例如說去舉牌，沒有勞健保，工作超時、薪資不斷下降這些也都沒有關係，因為只要讓他有個工作，他自然就會脫離遊民的生活。那麼真的遊民他是一個不工作的人嗎？他真的跟工作絕緣？那麼是不是說，只要是遊民他就不工作？工作的人他就不會變成遊民？其實這段話不用透過我的嘴裡講，我們警察大哥曾經在一個報導裡面，這位警察大哥說的很妙，「他說停車場裡面不都是遊民，為什麼呢？因為有些人白天都會去工作，晚上他可能一時找不到房子，暫時回來了這邊」。我覺得這句話很妙，他覺得遊民就是不工作的人，可是他很難定義說，為什麼有一群人明明去工作了，可是還是睡在台北車站？

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等於說看到了台灣遊民組成的轉變，他已經不再是過去所謂的老弱殘疾者，而是遊民確確實實的是底層勞動者，大量從事的是底層體力型的工作。像我們有許多朋友去做舉牌的工作，星期六日去舉牌，持續作了兩三年的時間，都是做這種臨時工，我問說那是不是想說找固定一點的工作，他說會阿，如果舉

牌公司願意讓我一到五也都去舉的話，我也願意去，但是事實上他就是只能做這種臨時工，或是說去做大樓洗牆的工作，或是出陣頭、工地粗工、雜工等等的。可以看到說，現在台灣的遊民從事的工作類型上面就是包括臨時工、勞工派遣、外包工、雜工等等的，有一個共通的勞動特色就是工作時間都非常的長，工作量都很大。

過去曾經跟一個朋友聊天，他去百貨公司的清潔部門做洗碗工，我問他進去之後工作狀況怎麼樣？他就說那裡的碗每天進去就是不停的洗，像是一個機器人一樣一直在洗碗，除了中午的休息時間以外，其他時間都不停的在洗碗，洗完碗就是切菜，切菜完就是出去擦桌子等等。又例如說工作沒有保障，大部分的遊民的工作沒有勞健保，加班更沒有加班費，有的時候遊民覺得奇怪，雇主明明跟我講說要給我加班費但是後來沒有給，那應該怎麼處理，我們就說按照勞基法阿，勞基法規定加班一個小時要給一點多少，就照勞基法處理，他說問題是轉介我去工作的人跟我講說，他跟雇主講說給我五十、一百給個意思就好了。有時候雇主又隨意苛扣他的薪資，像舉牌的案例非常清楚，一開始有拿到九百，後來變八百，他看你們這群人八百還是不出聲，那我降到750看看，750你們還是不出聲還是來工作，那我降到700好了，最近又降到了650。整個勞動條件就是隨著雇主的喜好一直下降。

再來就是說其實他們可能雇用的狀態就是很彈性化，他不是每天都能去上班，例如有人去做保全，他可能一個月裡面大約上8天吧，在假日去補洞，正式工休息的時候他去補那個假日班，只有過年的時候他可能可以上多一點的班，因為正式的員工都去休假了。

或是說遭到雙重的監管，例如說外包公司或是當地的主管。還有就是在工作的現場其實常常遭受到雇主的言語污辱，例如工作完中午吃飯的時候，有朋友在那裡吃東西，旁邊的老闆就忽然跟老闆娘說我養了一群豬就只會在那裡吃飯，或是跟其他人說，來上班的這些人，都是遊民等等的。

另外一個部分是說，在整個把遊民視為是一個不工作的人或是被救濟的人的思維邏輯之下，勞資關係是看不到的，反而是一個社會救助者或是受救助者的關係，好像我給你工作是對你的一個恩惠，他會認為給你一個工作就是幫助你，給你向上。我覺得說，在這邊看到了遊民整個的工作狀態之後，其實是要重新認知遊民的狀態，其實遊民不是一個固定身份，他是會隨著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他的遊民狀態也是會彈性的流動，當他處於失業或未充分就業的時候，他就是露宿在街頭或寄宿在朋友家、收容機構等等，當他就業稍微穩定，他可以負擔房租的時候，他就會去租房子。因此，很多遊民是徘徊在有時候租房子有時候住在街頭，這現象，是隨著他的勞動力的狀況在改變。

另外就是，這裡要提到其實整個勞動彈性化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會成為是遊民，不只是台灣發生，例如說美國，都隨著所謂的非典型工作的趨勢底下，美國的遊民聯盟也指出了將近百分之十三的遊民即使去工作了也很能脫離遊民的身份，或是說像加州那邊的研究也指出說，許多遊民去做所謂臨時的勞動力市場的工作，薪資非常低、工作不穩定，所以說使得他很難去脫離露宿街頭的生活，除了美國以外，日本的經驗也是，很多 NGO 團體的調查，是從日本大量使用派遣工以後，有許多人從事派遣的工作，但是當他失業的時候他失去了負擔房租的能力，被迫出來流浪等等。所以其實我們覺得在這裡要呼籲，在這樣的狀態底下，要去正視底層勞動者的勞動處境，怎麼樣去保障這些勞動者的權利，而不是將遊民妖魔化，或是說將所有問題用個人化的方式去處理。我先報告到這裡，謝謝大家。

戴瑜慧：

謝謝盈靖的介紹，那我們接下來請追影跟大家談談。

追影：

很感謝大家來聽街友遊民的心聲。我坦白說，遊民實在是不為人知的事情很多，現場所有的聽眾，所能體會，只有小小部分，除非你親身涉入當場，才能夠真正的瞭解遊民的苦處與處境。例如，我做的工作很多種，比如舉牌、出陣頭、還是說臨時工，我都有去參與，親身體會，實實在在去做，你才能知道當中的情形。

事實上所有這些工作，這些基層的遊民所做的工作，事實上都是非常的透支體力，但是所接受的工資非常少，工資為什麼非常少呢？就是剝削。基層介紹這工作都抽頭，這是很不好的作法，所以說有時候我想，奇怪，這工作應該是正常人去做可以拿到一千六一千八的粗工，但是我們去做只有一千，若是一千，遇到無牌的人力公司，現在社會很多介紹的人力公司，例如我去一間，因為這工作不一定，最後我去做的時候，我問去做這工作多少錢，他跟我說一千塊，但是我做回來只有七百塊，我說為什麼七百塊，他說要扣稅金，要報稅，700，我想說給他扣三百沒有關係，反正有工作最好，結果不是，第二天還是扣三百，我想這太驚人了，變成每天都是七百耶，對方說就是一千塊，他說你要做就做，不要做就不要做，一千塊拿去啦！我說你真是糟蹋人阿！我們人阿，若是要跟人抽錢，也要適可。像是去出陣頭也是，上次是一千塊，但是他現在一千塊是公定價，在廟宇是公定價，但是下來的時候經過一層一層的抽頭，我們街友遊民只剩下三百四百。

所以今天我們才決定要為街友、遊民出聲！說給社會的人知道，來對話。所以今天可以說做最基層、正常的工人，所做的工作反而比較涼，下層的，像我們街友、遊民去做，有人不去做，為什麼有人不想做？實在是受不了！工資跟體力的透支不成比例，甚至受傷的時候要自己醫，台灣話叫糊牛屎，沒有一個保障！所以說實在不是說要跟社會訴苦，而是希望大家能夠瞭解，是吧，要有包容心。我常聽人家說，不要管這啦，管了沒有用啦！真的阿，有時候會灰心，我們說的反而會害人。我說我們去做工啦不要在路上晃，

規勸大家去做，結果大家辛苦去做，我們看不下了。三四百塊也去做，被人欺負成這樣，說的人也要有良知。所以我今天很高興可以在這裡跟大家說明，感謝大家。

戴瑜慧：

謝謝追影大哥跟我們的分享，很多的雇主因為你是遊民的身份，他的錢就是任意的苛扣，甚至對你進行言語的污辱，因為你是遊民他可以罵你是豬，對你不斷的進行言語羞辱，而更多勞動的狀況是更惡劣的，那我們現在開放討論，我們這一場接下來就不休息了，等下直接進行文化反抗行動策略的部分。剛剛有與會來賓問到了年關的方案，那我們現在先看其他的問題。

第二場討論

與會來賓(黃小姐)：

大家好，我是東海社會學畢業，我姓黃。我有一些問題是延續上一場的，但在盈靖小姐的報告裡面，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遊民的時候，剛剛王增勇老師、黃麗玲老師都有提出來一些比較前面的問題，比如說，開頭的時候提到了我們的土地房產被大的資本所把持，高房價的情況，我覺得後面的議題，例如反抗的策略這東西比較是文化上的意義，剛剛我也聽到有一些朋友談論說，今天我們為什麼覺得對於遊民可以任意的驅趕他、隨便的壓迫他剝削他的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奇怪的東西我覺得是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安全感，我覺得這種安全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是一個幻想中的東西，可是大家都抱著那個東西不放。

幾個具體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王增勇老師開頭的時候，就是我們的社會救助的機制沒有發揮效能，我們講說遊民拿多低的薪水、那些薪資如何不穩定不足以讓他們餬口，但是有一個東西是國家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是沒有的，那個東西就是剛才王增勇老師提出的低收入戶的認定非常的繁瑣，這個東西我想要問的是，在運動上面，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知道了這個問題，是否有體制內體制外的攻擊或是試圖使他改善的東西？

第二個部分是剛剛黃老師提到的關於高房價，也提到了關鍵的案子、運動，也就是1988年的無殼蝸牛運動，這個東西到現在今年還是有街頭行動，我覺得非常驚訝，在我自己做國高中生的時候，我對無殼蝸牛的運動印象非常深刻，可是沒想到在我變成大人之後還是，當時他是一個這麼大的運動，但是他對這個社會的整個意識，中產階層對這個抵抗的意識完全沒有增長，這個東西對我來講讓我感到很疑惑、很奇怪，這東西當時可以造成那麼多人去露宿台北街頭，意識那麼清楚，到我們今天應該還要這麼覺得：我們每一個人隨時都有可能摔出去。我們在說派遣、派遣勞工，對勞工權益不保障，不只是遊民勞動處境而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勞動處境。

我自己在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這短短幾年之間，沒有任何一個工作是真正穩定的工作，也就是我所有工作都是一個區塊的，幾月到幾月，今年幾月到明年幾月。再說我現在的薪資，我一個月在台北租一個八千塊七千塊的房子，可是在我的朋友中間有很多他可能超過四千塊就沒有辦法，他必須要去住的房子，我住頂加，他可能就要去住木板隔間，當木板隔間也不行的時候，有一天你隨時都會摔出去的，可是這個東西並沒有在我們之前造成一個意識，為什麼我們還是這麼安全的覺得我跟他之間有那麼大的不同？這是一個我覺得有什麼方式讓社會抵抗的意識，能夠凝聚起來。另一個就是關於政治力量的問題，我有點好奇，在這些遊民之間，還有在投票的嗎？

追影：

絕對沒有人想要去投票！因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因為沒有得到什麼，去投票不喜歡阿，政府對街友沒有什麼幫助，非常的失望。

與會來賓（黃小姐）：

對，我在想，沒有一個地址的差別，包括剛剛談到救助、你要去申訴什麼的，你有一個地址跟沒有一個地址的差別，我在想政治力去怎麼長出來？

戴瑜慧：

你的問題真的是很棒的問題也很尖銳，讓我想起來我們海報沒有送。這個問題問的非常好，市民在裡面其實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例如說台北市政府的社福單位跟我們說他們一天到晚接到投訴的案件，一百件裡面會有六七十件是關於遊民的，就是說市民在裡面扮演非常積極的監督監視的角色，看哪裡有遊民他就去投訴，即便跟他們生活沒有任何的影響，他打過去就說你要趕快去驅趕，其實驅趕是沒有法律依據的，除了驅趕之外，他還要求通通抓起來，他要求警察說，你們公權力就是要把遊民抓起來送去收容所。

我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這個觀念是退回到19世紀的概念了，就算是中國大陸，他們在孫志剛事件之後，都不會有這樣把人抓起來關到收容所了，他們也開始修正這樣的法律，但是在台灣我們現在普遍的市民居然還有這樣的概念，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怕的，因為在這樣所謂的營造出來的恐懼感，政府的公權力會透過訴諸而去迎合市民大眾，營造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他不斷的去擴張他的公權力。

剛剛有提到憲法保障，你要去盤查臨檢一個人，你必須很確實的知道他可能的犯罪事實才可以去動作，但是我們朋友也常遇到，動不動叫你把身份證拿出來，這是一個違憲的，就是為了我要去迎合市民的一個安全感，我要打造一個安全的城市，他就將公權力不斷擴張他的施展範圍，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是說，市民是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所以我們對話的對象不只是媒體，不只是國家，甚至是這些市民，是非常需要對話的對象。再者無殼蝸牛對市民的意識的影響，我們請黃麗玲老師，王增勇老師或是郭力昕老師都可以來跟我們談一談這個部分。

黃麗玲：

剛剛問的問題很大，我也不知道我能回答多少，但我稍微提供我的想法來回答，第一個是為什麼無殼蝸牛之後，地價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我覺得那個可能說明我們的政府跟住宅發展商之間的緊密關係，自從1980年代之後地方派系上升到地方政府然後房地產部分，再上來這些民意代表，我們每次選舉就是這些人選來選去，有多少人沒有財團背景？我想應該很少吧！我覺得一方面是政商關係，這還是碰到我剛剛說的我們自己市民內部的認知的問題，也就是剛剛發問者很好奇的文化的問題。

住宅如果是一個商品的話，大概是一般人一輩子最有價值的商品，許多人一輩子的投資就放在這上面。所以變成一個很奇怪狀況，如果我是沒有房產的人，我希望房子的價格能夠便宜讓我進入，但是當我一有房子之後，我很希望房價不要掉下來，在買房子的過程，一般人的意識馬上就會這樣轉變過來。

與會來賓（黃小姐）：

其實我很好奇這一點：現在到底在台北市，有房子的人多還是沒房子的人比較多？如果說有房子的人就繼承了那個意識，那我覺得很奇怪：沒有房子的人在幹什麼？他除了在忙著讓自己有房子之外，他在幹什麼？比如說都更或是對農村的圈地，像老師剛剛提到的晚上那個農村的抗爭，整個農村不斷的圈地，政府跟財團不斷的把地綁架起來的時候，到底真的是有房子的人多還是沒有房子的人多？比例如何？沒有房子的人，他的沒有感覺是哪裡來的？

黃麗玲：

我覺得其實不是人數多少的問題，而是這個力量有沒有被組織起來，然後誰的力量大的問題。政府的住宅政策在裡面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政府從頭到尾，都不是提供政府的公有住宅，或是公共住宅這樣的方式，而是用讓你進入市場的方式。例如降低

airiti

利率、增加房子供給等等，我覺得這個過程是有影響，加速整個土地商品化、住宅商品化等等的影響。

回到你剛剛提的，什麼時候客觀的社會狀況會跟個體的主觀意識能夠吻合？我覺得現在人民還在一種迷惘狀態，還沒有真的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例如我常開玩笑的說身邊的朋友或是姐妹，你以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是你仔細算算看，加班的時間除一除，拜託，你根本就是底層階級！但你以為自己是中產階級，很多人也許一樣。

我們看看別的社會好了，例如日本，日本正在覺醒當中。日本社會從1990年代之前，的確累積了非常多的資產，但是從1992年之後到現在的狀況，大家可以去看國土資訊中心的各國房地產價格的比較，日本從90年代之後整個房地產直接急速往下掉，除了房產公司的資產縮水以外，還有很多90年代前期投進房地產的這群人。但日本因為還有一個國民年金的制度，所以現在年輕這代還有一些在靠父母的財富在撐的，例如說父母的年金或是之前的儲蓄，我們都聽過 Parasite 現象，年輕人都已經成年了但是還賴在家裡、賴著爸媽，現在這些人也慢慢變老了，逐漸也變成結了婚還在各自的父母家中，這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出去自立門戶，工作逐漸解組化，便利商店打工的這種薪水沒有辦法維持他們自己買房子租房子這樣的狀況。那我們觀察日本的政治情勢，之前自民黨選舉慘敗，還有日本馬克思主義的漫畫書暢銷，都說明了這個狀況，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越來越窮，不安定感也非常重，我覺得這是整個大的情勢的問題，總有一天大家會覺醒。

還有一點，接近空間的權利。剛剛提到說警察為什麼可以驅趕人？我在想他們可能用的就是「維護公共秩序」吧。這條法律可以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例如說集會遊行的時候，用在集會遊行的人身上，然後抗議群眾，他特別關注的人，也可以用在這個身上，所以這個東西，警察的裁判權很大，但為什麼用在街友遊民身上特別多呢，主要是因為沒有被組織起來，組織起來的力量還不夠大，當然

也是因為社會身份特別弱勢，但是我特別好奇，像是追影大哥說我們大家不要投票這種事，我不知道我們大家去投票，提出自己政策的時候會變成怎麼樣，我覺得好像只有組織起來才會讓自己變得可見，這是我的看法。

追影：

我們會盡量。

戴瑜慧：

我就是剛剛老師所說的啃老族，我們好多啃老族，歡迎加入。

與會來賓（范先生）：

大家好，我叫范軒昂，是世新社發所畢業的學生，現在服役中，我想要問朱理事長，就是從工會運作的脈絡來看派遣跟整個勞動環境惡化當中，我覺得透過像盈靖跟追影大哥剛剛說明，工會要怎麼組織跟團結去跟資方協商呢？我常常聽到工會領導人在對媒體訴求的時候說：我們現在薪資比外勞還不如，或是比勞動條件更弱勢的人還不如，以他們的處境來要求自己薪資的提昇，我想要說的是，在工會法保障之外的另一群人他們怎麼跟藍領或是白領這些勞工有個更團結更緊密的對抗勞動市場惡化的環境，我想要問的是不知道你有沒有思考這樣的問題？謝謝。

朱傳炳：

這個問題我們每年都在談，只有兩個字：團結。勞工要團結，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講了幾百年還是不團結，基本上他要有能量，一定是要組織，不管有登記的沒有登記的，都是組織，組織起來才會有共識，共識之後才能談那一些。所以如果遊民組織起來之後，最後會不會影響政治？政治就會分配一些利益，這樣才有機會。如果個別的話，走在街上沒有人理你，如果組織起來的話就可以去談判，如果今天遊民不組織起來，你要去跟社會局、跟政府要對話就有困難度，如果有組織起來對話機會就比較有。

而要不要把勞動條件提昇？只有你不斷的去檢視政府推行的政策的時候，像政府現在要立派遣法，工人一直反對，最後他不敢立派遣法，他要隱藏在勞基法，我們工會又對勞委會要求他禁止派遣，如果你的勞工如果沒有都是被雇主直接進用的正職，就會被人力公司仲介，剝削他的，我們以前的農業的時候，農夫有說菜蟲剝削你的菜價，而人力仲介公司我們說是人蟲，剝削我們的薪資，本來雇主要付你很多，但是到仲介，他不費吹灰之力就拿到暴利，叫做暴利行為，最後出賣勞力的人獲得很些微的報酬，這是社會不公平的狀況，政府卻能夠容許他，警察不管這些暴利與不法所得，以前政府還會加減的說這些菜蟲剝削了農民，直接會介入，要求不能在中間剝削太多，但是我們的政府現在縱容了人力派遣公司、默許暴利而不管，這就是背後有政治實力的撐腰，很多人力仲介公司背後是民意代表開設。

這種情況這樣下去的話，工會有組織的，公司沒辦法對我們怎麼樣的時候，我們有能力向社會大眾、政府去提出要求，如果小型工會他們勞動條件一直下降之後比外勞還不如，他的底薪有可能跟外勞一樣，可是他願意加班，加班機會卻是沒有的，因為要留給外勞，最後公司他會想盡辦法在你還沒有達到退休之前，故意把你資遣掉，連你的退休金都不給，工會再要求的話他就說我要移廠、移轉，資本全球化就是這樣子，這是最現實的。

比起房價地價上漲，對他們其實更遙遠，遊民他們不奢求這輩子有房子，他有生之年想都不敢想，在台北市有些正常的工作的勞工終其一生都沒辦法買起一間房子，遊民想都不會想，他現在想的大概就是三餐能夠溫飽，有個地方可以棲息，政府不但不能給他們福利，還對他們進行驅趕，這是我們最痛心的，正當的百姓應該受到保護才對阿！

那天我遇到一個社會局的，我說政府能讓他食衣住行如願的話，他說不是阿，可能不只有這樣子阿，如果他是在收容所裡面，

遊民收容所他管理極盡不人性的話，我寧可在外面自由自在的，不要看這些官者的嘴臉阿。所以我們一直去要求，勞工條件逐漸下降、派遣的囂張，外勞有沒有辦法取決，所以本勞要取得機會越來越少，所以現在新新人類宅男宅女不願意出門就是因為他自己根本沒有自信心，受到長者的保護，雖然他的父親可能失業，可是他可以用他之前累積下來的儲蓄，來照顧下一輩讓他衣食無缺，我們的下一輩沒有工作，沒有信心走出去就業去要求，我們可以意識到勞工就業市場是越來越淒慘的，加上政府的政策如果沒有在放到勞工身上，照顧有工作的人讓他至少維持，像我們去看新加坡，他們至少政府會蓋房子，讓他的國民能夠住進去，就不會有這種狀況，不過台灣政府沒有辦法做到，整個居住的政策都是有問題的。

戴瑜慧：

謝謝理事長，因為這個場地接下來還有要辦活動，在這場部分王老師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王增勇：

我針對剛剛講的貧窮的問題，我覺得貧窮在政策上面我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叫做絕對貧窮，就是台灣現在這種，有一個貧窮線，你必須經過我的審查之後才能成為低收入戶。但是比較先進的國家，其實是用所謂的相對貧窮，只要你的收入是全部人的20%以下，你就是低收入戶，這某種程度是認為貧窮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國家應該要進行財富重新分配，所以你不用開口你本來就應該受到國家政策上面的保障，那種貧窮政策就是更積極要解決五分的結構性貧窮。台灣的社會運動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碰觸到真正底層，今天有個主題叫做底層，真正底層貧窮的人，我覺得貧窮文化對於生活經驗到貧窮的人的主體性剝奪，我們不夠瞭解，不夠瞭解生命經驗怎麼讓他們沈默、不能夠發聲。

我想舉例，一個是成為低收入戶的過程，對一個人尊嚴的剝奪：我要承認我家庭失敗、我要承認我在市場上的失敗、我要承認我個人的破產、個人的失敗：我自己不夠努力所以我必須接受政府的補助。那落入貧窮的孩子，被家扶、世展會認養的孩子，這些孩子每一個月要對他的認養人寫感恩的信，他寫的信要被社工員檢查，這裡面有沒有不該表達的東西，有沒有表達一個感恩的心情。然後這些孩子如果長大了，如果他成功了，他還要成為所謂的自立青年，然後成為一種對中上社會的一種表達：我們沒有養錯人。這些人符合了我們中產階級的努力，我們沒有造成了貧窮的依賴。

或者是我們慈濟的訪問，如果在部落裡面，這些委員進去家裡面，我們常看到前門有這些委員進去訪問，家長就從後門跑掉，因為他們實在受不了這些委員進去以後，對他們的這種道德勸說、教育：你不要喝酒、你要去工作。就留下小孩子，任由這些人進去，在他家打掃整理。

我要講的是說，我們自己還不夠瞭解貧窮，我們現在這些脫貧的機制，對於這些生活在底層裡面的人他們主體的規訓，然後他們如何從這些規訓裡面認為他們自己是有權利的，要求國家、要求社會對於他進行補救或是保障，我覺得這些東西，我們的社會運動還沒有到達這個層次。我覺得今天很有意義的是提出那個「艱苦人」，如果這個是他們對自己的命名，其實我不知道如何用這個東西成為一種新的命名，重新認識貧窮的文化。

低收入戶，或是說，窮人很少有機會集結，就算是台北市有四個低收入戶的住宅，但是在這些住宅你可以發現他們彼此，因為那邊的家長如果有能力一點的話，會讓孩子越區就讀，因為他們不想讓他們的小孩，他們會認為別人的孩子會帶壞他的孩子，所以貧宅的社區裡面他們不會因為他們共通的身份而有相互的扶持或是認同，如果他們要自己發聲，如何讓他們可以有新的社區、新的社群的認同。我覺得那個東西會是底層可能文化反抗的重要的新的起

點。但是我覺得這些基本的功夫，我們都還沒有蹲點到，我就分享到這裡好了謝謝。

戴瑜慧：

謝謝王增勇老師，我們接下來進行下一場，謝謝朱傳炳理事長，接下來我們歡迎郭力昕老師到台前來，不好意思場地比較小。政治的議題，關乎我們生活中的個個面相，政治的議題必然要去碰觸，那麼該用什麼樣的方法去介入呢，是以代議政治的方法？或是以什麼樣的途徑呢？那我們現在至少採取了一個把美學政治化，我們剛提到貧窮，我們簡單講，這是一個貧窮的問題，但是貧窮也是有貧窮的美學，那我們這一場就是來談文化行動反抗策略，那我們首先來看一段影片。

第三個主題：文化行動反抗策略

（播放影片：北市議員召開記者會，爆台北車站遊民多）

戴瑜慧：

這個不到兩分鐘就給你一個很聳動的事件，那我現在先跟大家介紹從漂泊新聞網到遊民攝影班的過程。

第一張

剛剛那個其實就是一個言詞非常非常聳動的新聞，那麼簡單回顧一下：他裡面提到遊民天堂、突襲，然後夜歸婦女的一大威脅、受到驚嚇還要給人去收驚、然後一連串的通緝犯、前科犯、不定時炸彈、慣竊、性侵害前科。

下一張

那整個就是讓你感受到他是一個拿你來開刀的犯罪者，然後這群犯罪者還非常非常可怕，為什麼可怕，因為他數量越來越多，然後還躲在各個角落，然後躲在各個角落裡面，他還會對婦女，特別是婦女產生莫大的身體跟心理的威脅，威脅到什麼程度，威脅到去

收驚，我們通常去收驚是看到鬼才要去收驚，等於把遊民就是妖魔化，等於你就是妖魔鬼怪，看到鬼一樣。然後因為這群人好可怕，而且還目無法紀把台北車站給占據下來成為他們的天堂。

那怎麼辦呢？我們台北市的這些議員要怎麼辦？他們就要代表國家出來說：我們要加強國家公權力，加強去驅趕他們。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裡面就是製造一種二元對立。這對於一個人的尊嚴挫傷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後現在是一個 web 2.0 的年代，就是大家可能都有部落格或至少會用 MSN 或是用 FACEBOOK，就是你有一種慾望，你要表達你自己，你想把你想說的話，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們的朋友他卻...我們的朋友，常常會唱這首歌：心事誰人知，就是你很難去表達你的意見。

下一張

所以在一個長久的這樣的壓抑之下就形成沉默，然後慢慢的就開始絕望，那為了打破這樣的集體禁聲，讓你不能發出聲音的狀況，我們在07年的時候，開始形成一個固定的討論會，然後希望透過這樣的模式，大家可以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可以講話。

下一張

在07年10月1號的時候，剛剛講的那個某大報，其實就是聯合報，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大報，那他那一天就是2版全版有四則關於遊民的新聞，然後〈台北車站兩個世界，貴婦變棄婦夜夜查車站〉，然後第2則新聞是〈尬車給警察追，午夜遊樂園〉，第3個標題是〈遊民也需要愛，摟流鶯，小旅館溫存〉，第4個是〈遊民也要工作，舉招牌一天賺幾百〉。那大家比較想看哪一則新聞？我知道有些人想看有流鶯，然後有些人可能想看貴婦變棄婦，那我們那天在討論裡面，其實最引起大家討論比較激烈的，其實是最下面那一則：舉招牌，一天賺幾百。

下一張

那其實剛剛也有看到，就我們第2場有談到舉牌實錄，就是他那個報導是錯誤的，就是講成是三百台幣，然後又再度強化你遊民就是酗酒的人，這樣的刻板印象。

下一張

所以我們就拍了一個這樣的舉牌實錄。

下一張

然後這個就是漂泊新聞網的開始，其實我們的那種感覺就是沒有人會，我們都是後來才去跟人家借攝影機，慢慢學的，所以那種感覺是被逼上梁山，那一般我們看到媒體的錯誤報導，你可能會想說：唉呀！我去要求更正！但是很明顯啊！媒體他不會理你這群人，因為你是遊民，那怎麼辦？所以那樣的原因才走上了另類媒體的道路。

一方面也是公共電視他現在建了一個平台，就說現在一個媒體科技，他可能讓我們 access 去使用媒體的近用性的門檻稍微降低了一些，那我覺得很有趣的是說，在漂泊新聞網上面你跟其他的網友和社會大眾建立另外一種對話的管道，就是在媒體上一般看到的民眾跟遊民的關係就是對立的，民眾跟遊民就是互相對立討厭。但是，實際上不見得是這個樣子的，那我們在網路上其實獲得很多朋友他們的支持，然後也就後來有更多的勇氣，陸陸續續去做其他的報導。

下一張

當時我們只有借到一台攝影機，技術上也比較困難，我們就在想說是不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媒體用最簡單最舒服的方式讓遊民朋友使用，能有最容易用的一個方式，我們有些朋友他是文盲，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我們就用攝影的方式，所以我們就開了遊民攝影班，就是第一年。

下一張

08年6月的時候，然後...那其實剛剛講到貧窮，我們就是很窮，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上課的方式其實就是在一個乒乓球桌上面。

下一張

其實很多朋友在問說：遊民攝影班，你們怎麼會有那個相機呢？其實物資的匱乏是一個問題，但是其實更大的問題是來自其他。譬如說我們跟坊間其他的攝影班不一樣的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特殊的困難。譬如說相機，他對我們來講，甚至是以前追捕我們傷害我們的一個武器，所以你首先要去翻轉先去克服你對這台相機的恐懼，就是從一個被追捕的人，被相機追捕的人翻身為一個你去使用相機的人，那是一個需要心理調適的過程。

我們在整個攝影班裡面，技術絕對是第二的層次，因為第一個層次絕對是先恢復人的自信心跟尊嚴。因為剛剛提到說，長久以來這樣一個污名化的報導，以及社會的形式，其實對遊民的自信跟尊嚴真的是踐踏到一個極致。

像我們那時候就是用即可拍的相機，然後一個阿伯他甚至會說：你相機不要給我，給我是一個浪費，就是他覺得他是沒有資格去用那個相機的，那是一個浪費。那個時候，愣到，就是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對話，那就跟他講說：阿伯你不用，才是一個浪費。就是那個鼓勵，是最重要的。如果當你自己是沒有自信、沒有尊嚴的人就不可能去拍照了。

所以其實在攝影班一切的重點，都是營造成一個舒服的空間，在那邊覺得舒服，然後你慢慢的用這個小工具，讓你去表達你的想法，然後那個才是攝影班最重要的目的。

下一張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前面花的，其實只是即可拍或者是非常非常簡單的那種二手相機。但是我們的朋友是要花很多的時間去熟悉那個相機，因為其實很多朋友，一輩子都沒有碰過相機。

這是我們覺得比較遺憾和驚訝，就是我們都說台灣錢淹腳目，台灣走過富裕的年代，但是我們卻有很多朋友，他四五十歲五六十歲，他可能從國中就開始勞動開始工作，可是他一輩子都沒有碰過相機。所以前面花很長的時間是，你去熟悉，就是他根本不知道那個景框在哪裡，你那個手的距離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那其實很像打太極，就很像你要去知道，那個景框在哪裡或動作。

那其實都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摸索的過程，他就是一個新的接觸。所以第一年其實大家就是自由的拍，愛拍什麼就拍什麼，我們是後來看了這些相片以後，才發現裡面有很多主題，其實隨著遊民他的游走，其實他就是記錄了台北的角落的生活。然後第二個是說，其實很多朋友他是很關注，他自己覺得是個艱苦人，所以他關注其他艱苦人的生活，然後再來是說他們用自己的觀點去詮釋審視遊民。

下一張

所以很多朋友住在地下街，所以這是一開始跟我們第一張開始遊民攝影班一開始跟大家分享的照片。然後我們常會去逛夜市，然後是夜市的照片。

下一張

然後也很關注其他的，譬如說這一個朋友他會為什麼拍這個小販，那他是用說：你看喔！他是一折，這表示台灣的景氣已經不好到什麼地步了，居然到一折！

下一張

很多朋友，他是從早到晚待在公園裡面，然後紀錄下公園在各個時刻不同的活動。這張非常的有趣，他就是一邊是外勞一邊是雇主，然後他其實在這邊找到他們的朋友，然後一起相聚。那其實是很有趣的，把台灣現在的社會變化也紀錄下來。

下一張

這是我們拿到相片以後，你一般媒體上面拍遊民，都是從後面，偷拍或追拍，所以你拍到的遊民都是倉皇而逃或是趕快閃之類的，我們自己拍我們自己，那就是不一樣，你會看到笑容，那個笑容在一般偷拍是看不到的，然後他會做鬼臉給你看。譬如我們會說，真的要放這一張嗎？好看嗎？然後他就覺得他是心情好，我才做鬼臉給你看，然後他告訴你：我不是常常都心情很好喔！這是很難得的喔！

然後這張呢，就是阿春姐拍得喔！他很得意，那些男模其實也很得意，他會一直跟你抱怨：為什麼要拍我！可是每次有人來看一次攝影展：討厭啦！都要拍我！就是男模也偷偷得很開心這樣。

下一張

我們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有時候我們拍攝的東西是種有感而發，他在裡面也感受到我們遊民是什麼？譬如說他可能覺得我就是水筆仔，然後就是流到哪裡落地而生這樣子，或是覺得自己是夾縫中的草，必須在那種困頓的環境當中掙扎求生存，這也是我們第一年衣服的圖案。

下一張

其他大家都看到那個漂泊新聞，我們剛剛也笑得哈哈，那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在貧窮當中，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大家在裡面做事情，不會事先去寫計劃書，找錢，而是先 DIY 看有什麼東西是我們可以自己做。譬如說那時候就是覺得沒有主播台，然後覺得怎麼辦？有人就旁邊就推推推，把一台除濕機給推出來了，就把他弄一弄再 DIY 就變成一個主播台。所以我們紙板真的是我們的好朋友的样子，常常 DIY。

下一張

這是 DIY 精神，就是沒有什麼花費。

下一張

我們就是在一無所有當中進行創造，這是阿寶的照片，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拿相機。

下一張

然後這是我們第一年的攝影展：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那我們今年呢，也出書了，就把08年跟09年的經驗整合起來。

然後下一張

其實我們在裡面也獲得了一些，每個人都有一些人生的改變，像阿春為什麼拍的好，我覺得跟他很積極的拍照是很有關係，為什麼他會很積極的拍照？是因為他覺得拍照已經成為他人生很大的安慰。那待會阿春也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下一張

這就阿春的照片，就是就是讚！

再下一張

然後這是09年的街頭巷尾攝影展，那一年最大的特色是我們辦在戶外，所以那個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大，就是照片畫版這樣。那其實跟大家偷偷講一個小故事，那時候為什麼死命一定要辦在戶外？雖然戶外的錢會比較高。是因為那時候某位里長，就想要趕遊民走，那我們就想，到底什麼是社區？我們遊民也在社區裡面，也跟你共同的看日升月落，跟你一起呼吸，那你在做這個決策的時候，你會說你是一個社區決策，這真的是社區其他居民也這樣認為嗎？並不見得！遊民難道因為沒有一個房子在那裡，他就不是一個社區的一個共同體嗎？這是我們那一年為什麼辦戶外攝影展的原因。

下一張

第二年我們開始拍人像，其實拍人像，是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克服這樣的一個恐懼，就是要去跟人進行互動。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我們遊民朋友，自己拍自己的朋友。

下一張

然後，到了今年呢，今年我們在談，我們要決定今年的主題是什麼的時候，今年冬天在尾牙的時候，朋友就提到說經過兩年，覺得可以更直接的來談跟遊民相關的議題。那跟遊民最直接相關的議題是什麼？雖然很多底層的勞動者，生活工作也很辛苦，但是你可能會想說，我回去先睡個一覺，再來想明天怎麼找工作。可是對遊民來講，他可能馬上立即要想的是，我今天晚上要去哪裡睡？

就是那個居住，還是一個最迫切最迫切的狀況、問題，而且也是跟其他人最大的一個不同，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尾牙在談，我們就來談居住權吧！而且這也不是只有遊民面對到，他是一個許多弱勢族群都要共同面臨的社會矛盾。

下一張

然後我們在攝影班的時候就在討論這些社會政策，像剛剛就有提到很該死的國有財產局，他過去賣地賣了5千萬坪，那我們有一個主題是隔板屋，其實就只是1坪，1坪我們就有隱私權和一個居住權的一個空間，你卻過去賣了5千萬坪，就可以來看這個社會政策公義性，到底是怎樣？

下一張

然後我們一天到晚在講豪宅，到底豪宅後面是誰的血汗？然後這也是我們的第一個主題，因為我們後來朋友拍回來的照片就發現，就透露了這樣的一個主題：那有洗牆工啦！舉牌工啦！建築工！

下一張

舉招牌。

下一張

洗牆。

我們那時候有做討論，就討論說大家去住過哪些地方，然後公園、車站、街道、網咖、收容機構、廟宇、天橋下、醫院等等，然後墓地也有，但是只有3個人舉手，因為大家真的還是覺得墓地毛毛的。

然後下一張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那個片子裡，後面大家唸的，其實就是這個歌詞，自己寫的，就是那種居無定所的心聲。從故鄉到異鄉，四處漂泊四處家。這就是一個從漂泊新聞網到遊民攝影班的一個文化行動的反抗策略，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策略是因為：其實盈靖也跟大家分享到很多，遊民他的勞動狀況比很多人是更差的，就是平平一樣領一萬塊，你會因為我是遊民就給我六千塊，然後還罵我是豬，就是你那種勞動狀況更惡劣。但是當遊民好不容易去提勞資爭議的時候，往往公務員或是這些 NGO 就把你壓下來說：你不要去爭啊！你爭什麼？你是個遊民阿！就是你有就好，然後資本家他當場就轉換成一個嘴臉，他變成慈善家，他以慈善之名行剝削之實。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談論到說：沒有辦法，你去爭取你的經濟公民權的時候，你也必須去爭取你的文化公民權，你必須先去社會去講，去撥掉你身上的社會汙名，你才能夠去跟社會進行對話，不然其實他會因為你是遊民，你什麼話都不用講，他也不要聽，所以，那是我們的一個經驗上的一個累積的結果，就是說認為你文化公民權跟經濟公民權必須要同時去爭取，那這是我們的經驗分享，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到政大廣電系系主任郭力昕，老師也是長年以來對媒體改革，對社會怎麼樣應該更進步提出很多尖銳的一個批評，也是我們很多朋友思想的啟蒙者，我們謝謝郭老師。

郭力昕：

那個，沒有那麼嚴重，（爆笑）搞得我更加不安。那麼來談一下文化行動這個議題喔，那當然行動是放在遊民行動聯盟、當代漂泊，他們用這個漂泊新聞網新聞跟這個攝影展，各位知道在當代漂泊之前，TIWA（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他們更早幾年開始，也做了用攝影，接下來就用紀錄片，這樣子一些影像的一些創作的形式，來對這些外籍的移工，做一種培力的一個方式，原意也不僅如此，一方面培力，一方面自我呈現自己，不等著別人來再現他們，也在培力跟自我呈現的過程裡面，找回他們的更大的一個自信和尊嚴。

相對的來說，當代漂泊，像剛剛瑜慧講到，其實更困難啦。因為其實說像外籍移工，他當然其實在台灣普遍的一個情境，還是程度不同的被歧視或被不對等地看待，但並不表示他們自己對自己沒有自信，他只是到你這個比較相對有錢的國家，然後被集體的歧視，他們自己譬如說可能菲律賓來的，他們很多是大學畢業的，所以他其實對自己內在自信是夠。但是這些遊民朋友，他們就比較更辛苦很多，當然也會比較...，那首先要撿回他們自己對自己的尊重跟自信，也有很多的辛苦。我想他們的行動、作法，大家都已經看到，反應在攝影展上面，反應在漂泊新聞網上面，都非常有意思。

這當然他們在做一個另類媒體，是因為我相信這個當代漂泊的朋友，他們並不是不想用主流媒體，是主流媒體沒有興趣這個東西，一講到媒體我真是充滿尷尬，因為每次這個台灣已經被這些主流媒體搞得亂七八糟的時候，很多朋友就...大概是說，「都被你們教壞的，你看看，這些新聞傳播的，你們怎麼教的！」就是變成這樣喔。

但是政大傳播學院也教出瑜慧這樣的學生，但是這些進步的朋友，看不到。不管他們，他們的層級沒有辦法被看到，因為即便是我們的公共電視這樣的機制，也到這幾年才有 peopo 這樣公民新聞的東西，之前他的公共性也遠遠的不足，可能也不能夠完全怪公共電視，雖然他們有部分責任，他們的經營管理者其實對公共理念觀念是不足的，他們只有「優質」這個理念，沒有太多公共理念。但

另外一方面是制度性的問題，因為並沒有給公共電視一個充分的空間、預算，讓他們能有更好人才，能夠去理解公共是什麼東西，去把它的基礎作大、把影響力弄大，所以像剛剛中華電信工會朱理事長講的一樣，他說其實藍綠都沒有勞工政策，同樣藍綠也都沒有媒體政策，他們其實是不在乎這個政策，到目前為止，藍綠的這種政治的結構，他們所想要鞏固或是取得政權的策略還是一種短線式的，不是政治上面長遠的規劃，所以媒體讓他很想控制又很怕人家說他把黑手沾進去，所以他就一直不碰。

所以實在不能怪商業主流媒體的記者很白目或傲慢，雖然他們最後表現出來就是那個樣子。但是更大的問題是在尺度上面，我們沒有這種商業的惡質競爭以外的一個能夠讓公共議題比較深刻的、理性的發聲的、基礎夠大的一個公共媒介，這就是我參與的一個媒體改造運動長期以來做得不太成功但是並沒有想要放棄、繼續努力的這樣一個組織，試圖要幹的事情。

除了這個以外，時間有限，我想很快的談一下文化行動跟社會運動的重要性跟方式，重要性我想不必多說，方式上面，我想要提一下我的觀察，我並不是一個社會運動的研究者，我只能就我有限的觀察，就我過去這些年參與的、零星的、業餘的參與這些社會運動，特別是跟著在過去六七年來一些年輕世代他們所組織、主動發起的一些社會運動，跟一些運動團體他們的一些經驗，所觀察到的東西，我在想這些觀察是不是某種程度可以回應剛剛那些東西，一位社會系所，剛剛我坐在後面沒看到是哪一位，剛剛很好的提問，試著做一種可能的解釋，我不太能確定對不對，我一邊在聽問題一邊在整理我想要講的東西，想到也許會有一點關係。就是說，我看到過去幾年來新世代的這些進步青年他們的社會參與、政治行動跟過去的世代，再遠的不說，再遠也沒什麼社會運動的空間，從解嚴前後開始，社會運動、黨外運動、制度改革這些都包括在內的那種實踐想像有很不同的內涵。

簡單的說，新世代的過去幾年來，我看到的，舉幾個例子：當代漂泊、TIWA 都是非常鮮明、精彩的例子，這些例子還有很多，就是說新世代的社會運動他們的文化行動是聚集在具體的問題、對象、事件上面，當然他們會，像剛剛王增勇老師講的，我們現在還很缺乏，但是我們這些年已經開始了，這些年輕世代的行動者都蹲下來、持續的，就一個特定的社群、特定的對象，或者是遊民、或者是樂生院的院民、或者是外籍移工、或者是公娼、性工作者等等，持續的、幾年或是多年來一直進行他們的行動，有計畫的、長期的、日以繼夜的做這樣的東西。

他們相對那些理論的上面、意識型態先行的宏大論述，或是希望台灣如果要有進步的社會改造必從一個很大的組織開始，例如我們必須有一個左翼政黨。我們過去台灣有阿，有勞動黨、工黨...不管叫什麼樣的黨，以關心勞工為主的，都失敗。失敗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我想可能有一個原因，是說：覺得那個組織一定要先有那樣一個大東西，像歐洲有左翼政黨、工黨等等的這樣一個來對抗資本主義的政黨、右派政黨，我們才可以開始去平衡。

但是，卻忘了我們的社會基礎，其實恐怕我們長年對左翼一種從理念到實踐的空白，如何能夠忽然出現左翼政黨然後他就可以有效呢？就像我們長年並沒有一種公民意識，我們怎麼會出現一個公共電視他是像 BBC 或 NHK 呢？是不可能一夜發生的，這些東西都是需要學步，而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累積，從錯誤中學習，迂迴曲折的，就像我們的民主化學習一樣。

或者是說過去的一些實踐者，常常很快就把實踐給論述化了，實踐常還是在論述上，因此，也許我們有太多的論述跟理論，有時更糟糕的一點，會比誰讀得馬克思比較多。這種東西常常其實跟他們所宣稱的，我相信也是一個真實的宣稱：要去關心勞工、底層、弱勢、農民等等，其實他並沒有，而是一直在他們自己的論述甚至想像裡面進行所謂實踐。這些新世代的行動者，把他們的行動、運

動日常生活化，過去的一些政治參與，是把他們的參與跟行動外部化。所以，知識份子有一個理想：我們就應該關心工人或是農民或是底層，然後我們去做，然後發現很快的，也許會有挫敗，發現沒有方法，然後退回到論述裡面去。

那現在這一些行動者，他沒有那麼大的一種包袱，說我一定要先有一個左翼的所有正確的理念、論述、理論等等東西，這些配備都弄好了我才要開始去做，或者是說我們要先檢查誰比較純正等等這些東西。他們就是開始做，是素樸的。當然這些年輕行動者都有很好的基礎，但是我只是要說，後面那個想要參與社會的概念的次序不太一樣，我們得說，辯證的，台灣到目前為止，走的不怎麼好的民主化比較有關。在我們民主化的過程裡面，甩掉很多原來的，一種關於知識份子怎麼去參與公共議題或公共社會的做法是那個土壤的改變。這是我覺得非常欣喜，雖然我們還是舉步維艱，我們還是非常辛苦，但是我覺得樂觀的期待是可以在這個地方，因為覺得是個開始：台灣的文化行動或是社會行動也好，或是把一些議題政治化，是在走一個新的路，還有一點很重要的說，我看到這些組織，包括我剛提到的遊民行動聯盟、當代漂泊、到 TIWA、到青年熱生聯盟、日日春。

甚至像我前2天才去綠島參與一個白色之旅-認識白色恐怖的一個體驗營，是由一群年輕學生組織起來的，他們的一個開頭者是一個台大社會系的研究生，然後他們做政治受難者的口述歷史，做著做著，他們就越挖進去，他們就越奉獻到這裡面來了，就開始辦這個營隊，辦了三年六屆。那天我去他們放了春天許金玉的故事的紀錄片，我帶領了討論，其實我主要是跟著聽課，他們邀了五六零年代的政治受難者，最年輕的也已經七十多歲了，大家知道綠島，火燒島那烈焰當空，非常辛苦，然後他帶我們去走以前的綠島監獄，去體驗以前那個生活，熱得不得了。然後這些老先生們，他們精神昂揚，為什麼？他們其實不願意面對這件事，這是非常痛苦的阿，

再剝一次他們的傷疤，但他怎麼會願意來呢？是這些年輕學生感動他們了，在做口述歷史，訪問他們的時候，看到了他們的真誠，而且口述歷史不像以前某些人類學家剝削完就走了，成為自己的學術成績。這些學生在生活上照顧他們，三不五時去拜訪他們，有些是孤家寡人一個，因為你被關了三十年，沒有人想要嫁給你，你跟社會關係是割裂的階段。這個東西讓這些前輩、政治受難者非常感動，這種精神，總結在這個現象上面，這些組織，他們對人的平等互動，那種關照、扶持，是行動的基礎，他們把真正關心人，而不是意念、議題這個事情，落實成為他們行動具體化的最堅實的基礎。這跟我們過去有時候把一些社會運動議題化、理念化只是這樣子，仍然在一種日常生活上真正看到這些我們需要去結盟、關切、扶持、協助他們培力壯大，然後他們自己可以遊民組織、移工、或是性工作者，他們自己可以開始有力量可以組織自己，這樣子的行動，過去的失敗，好像文化區隔，仍有一點格格不入，那個尷尬，很明顯。

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必須尷尬承認，就是說我參與這個參與那個，其實我沒有他們的語言，因為我沒有進去，沒有蹲點，沒有長期的陪伴、扶持、成為朋友這樣子，我想這是大大的不同。因此，我想，剛剛這位社會學的朋友她在問：1988年那個夜宿街頭行動，今天過了20年好像沒有產生什麼效果是很不可思議的，確實是。中產階級莫名其妙、還有的錯誤的想像，這個東西，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問，是一個很好的反思。過去20多年來，我們的社會運動是怎麼回事？我們真的...我想在場的年輕世代，我相信大家都是積極、願意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參與公共議題的這樣的朋友，我相信各位絕大部分、所有的人都會是未來進步的中產階級菁英，我們是這個身份，我是中產階級的，各位大概也都是。我們需要深刻的反思：為什麼20多年來的社運沒有多少進步性？或者沒有一種積極性讓他改變，這是什麼原因？政治的、社會的、進步的根基是不是不夠結實？不夠結實的原因不只是行動者的人數不夠，或是量的不

夠，更恐怕是一種進步行動，或是社會參與，做為一種承諾、一種志業、一種生活方式，他內化到我們的一種信念裡面的一種狀態，到底我們可以把它走多遠？我們如果內化變為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愉悅於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就有可能有很多無限的進步，不同的進步世代，可能30歲以前是進步的，30歲以後，發現他忽然虛無了，或是什麼原因，他走到了進步的對立面，他也許不反對這個，可是他就無疾而終。

這個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我們也要思考，我們有沒有更好、更有效、更務實的運動策略或方法或組織能力，剛剛有些與談者都提過了。我想台灣過去到現在為止，我一直感覺到很沮喪的就是，不管什麼文化行動、社會運動、甚至只是一點文化參與好了，藝術或是種種參與，放眼看去全部是30歲以下的人，這是很奇怪的一個社會。在一些國外的社會裡面，聽場演唱會，搖滾樂或是怎麼樣，裡面五十歲的老頭子比比皆是，你去看影展，不是只有年輕小青年排隊買套票，個個年齡層都有，我們的社會顯然出了問題使得一些原來進步的，豐富生活的，先不要說參與政治社會，就豐富你生活、生命意義的那個事情，在30歲左右就停止了，然後就開始進入一種規律、平板的生活，賺錢、往更上一層走、回家看電視，沒有性愛。我想這是一套，我想基本上他已經死掉了。我想要說，八月初在座很多朋友都熟悉的(諾姆·喬姆斯基)要來台灣演講，他多大年紀了，至少上80了，他是一個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家，他更知名的是，他對美國的國際政治的批判，毫不假詞色，永遠是這樣奮進的。他不是唯一的例子，我們看到很多搖滾樂手，60多歲了還是在那裡跳來跳去的唱，這種精神，是我們相信社會有進步與多元跟人的意義可以把它日常生活化的方式。這些東西是我看到台灣的年輕世代已經這麼做，所以我非常欣喜的覺得是說，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行動的概念，把文化行動轉成一種行動的文化，我們終於可以有這樣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相信行動，是相信團結的行動。相信行動是一

種每天生活的方式，不是偶一為之的一種激情，一種浪漫化的東西而已。這是我從當代漂泊的這一群朋友身上學到的，稍微做一點我的分享，謝謝。

戴瑜慧：

非常謝謝力昕，一個尖銳的批判跟反省，保持運動持續的往前進。今天很謝謝大家的熱烈參與，因為接下來場地有人使用，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移到我們攝影展的場地再繼續聊一聊。今天真的很謝謝大家，希望以後還有更多對話的機會，謝謝力昕，謝謝大家。